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論选輯

（第 二 集）

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組

1957.10

這裏又選印了我校教師（包括進修教師）、輔助員和學生中的部份右派反動言論，供校內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課程參考。有些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行，還可以參看我校出版的"學習簡報"。

這份材料仍採取抄錄原話的方法。我們只做了一些必要的選擇、分類。有的加了標題。個別的地方加了一些按註。

材料來源包括：本人交代、檢查、大字報、會議記錄、班、系供給的綜合材料以及報紙等。為了簡化，一般不再在每段摘錄下註明出處。

南開大學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教研組

一九五七年十月

大二

150

目　录

教师、輔助員

学　生

歷史系教授 雷海宗

(一) 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

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有一个根本問題；社会科学是随着資本主义产生而产生，是到資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眞正的科学。

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是在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列宁的帝国主义論，在希特勒上台后就过时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書也过时了。

石器时代不可能有資本主义社会，可見生产工具决定意义是大的。

国家不是阶級的产物，而是官僚主义的产物。

农奴，奴隶兩字的拉丁文都一样。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工具都一样，因此沒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分。

人类文化最重要的时代是資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是資本主义的延續。

要根据生产关系来划分历史时期，那原始社会和將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历史該如何划分哪？

所謂五种生产方式只是根据极小范圍的材料講的，現在我們知道的事情很少，有的虽然文化很高，但是沒有文字記載，如火星的事情我們还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太阳系，还不知道宇宙中其他系，以后如果我們知道了，則現在我們所說的，只是根据极小范圍的材料，所以对事情不要輕易下結論。

五种生产方式的提法，馬克思沒說过，是斯大林提的。

土地在各朝各代都是国有。

將来星球上有了人类，是否也有五种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发展規律是循环的，周而复始的。几年几十年要有一次大战，这是規律。

資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級貧困化問題是不存在的， 只是分配多少問題。

在希臘哲学史上无唯心与唯物的斗爭。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把語言放在第一，目的是想消灭猶太。

在資本主义国家，进步学者研究了几十年还搞不通什么叫資本主义，不知道資本主义是什么。

五种生产方式是总結出来的，不是历史发展规律。

"共产党宣言"是 1848 年前的作品，对很多問題沒有接触过，在1895年后馬克思主义是一隻脚走路。

馬克思在哲学上沒有什么。

馬克思主义不只在 1895 年停止了发展，而是在 1877 年（按恩格斯"反杜林論"出版的那一年）就停止了发展。

方法不是容易的，是經过了資本主义社会长期的訓練。立場观点可以一下子改变。只要学会严格的科学方法，就会符合馬克思主义。

哲学家并不自觉的有什么立場。

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根本沒有資格批判罗素，因为罗素是偉大哲学家，大数学家，除非对数学有研究，才有資格批判他。

政治課搞不好，就成了大一公民，我对这个問題考虑了很久。

国家不重視社会科学，国家重視馬列主义，实在馬列主义几个月就能掌握。

研究历史很难，历史学問和政治有矛盾。

"共产党宣言"头一段，最后一句，就是从圣經上来的，所以必須知道圣經。

大家都推崇馬克思主义，但推崇的标准是什么，实在叫人迷惑。

馬克思一句偶然的話，今天大可不必推敲。

现在教哲学、馬列主义基础、革命史的人，实际上害了他們，以后怎么办，一点史料也不知道。

（二）攻擊共產黨

各地有許多半秘密半公开的組織，也有許多割据或想要割据的离心勢力，惟一好似新奇的角色就是共产党，其实共产党若剝去外来的一些名詞与口号，不过是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帶有宗教性的以餓民为基础的割据勢力，他的唯一眞正特点就是依附外国，否認国家民族，这也是他始終不能取得其他秘密团体的信賴与合作基本原因。

（"論中国社会的性質"）

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宗教运动，在本質上是排斥異己的，在主义上是定于一尊的，共产主义与其說是一种哲学，不如說是一种神道，共产党与其說是政党，不如說是个教会……··共产主义取得的不是理智上的了解，而是精神上的安慰，正如南北朝、隋唐时代东亞各国佛教徒亲印度为'西天佛国'一样，今日世界各国共产党徒以苏联为'北天乐园'过去的列宁，今日的斯大林，在共产党員心目中不是不普遍的党魁，而是神秘的教主。………基督教在耶穌死后不久，就已发生派系之爭，兩千年来大小的分裂，无从統計。今日基督教二三百个大小的派別，无不自称为合乎正道的教会，现在共产教也已开始重演这一套历史，……。

（1948年8月28日益世报）

除中国外，各国共产党都有个人崇拜，特别是英美共产党，党的組織等于独立小王国，所以知識分子很少参加党，参加后受不了也只能退党。

美共沒有知識分子，要建設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工农知識分子水平太低。

美共已彻底瓦解了，修正主义已經占了統治地位。（匈牙利事件后美共代表大会时說）

英共、美共的参加者都是非馬克思主义的知識分子。

战后的英国，与法国所差无几，它优于法国的有二点：一、它沒有严重的共产党問題， 因而无論如何发展， 它內部的統一性不致发生动搖；二、它有永远可靠的美国援助………。

（三）反對黨領導科學、抹殺新中國社會科學的成就，企圖使資產階級社會學復辟。

現在史学界領导都是外行，这問題很大，史学很难发展，不知道党中央是否知道。可能有兩种情况，一是不知道，一是知道了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指現在历史学会工作的領导人員）都是統战对象。

党的領袖忙于当前革命工作，这搞的很好，但科学应由科学家来領导。

社会科学……中国中断……八年，……社会科学是資本主义的产物，中国未經資本主义阶段，所以社会科学不发达，……。

中国社会科学的十二年規划太龐大，没有办法，搞哲学的没有，經过严格訓練的人很少，搞历史的过去有些留学生，但都是学上古中古史的。

十二年科学規划訂得主观，不会完成。

十二年科学規划即使完成，也最多改变目前落后狀况。中国社会科学的困难不是十几年，而是几十年的問題，……。

中国老的学者已經老了，年青的又学的是教条，所以历史科学就中断了。

中国科学院根本没有成立的必要，而且毫无成就。人民大学没有培养出什么人来。

現在搞社会科学的有三个类型：一是資本主义的方法，这些人数很少，从回国后就落后了，接不上去，現在老了后續无人；二是封建主义的方法的人如范文瀾；三是現在教条主义的方法的人，这些人都不行。中国没有一个称上学者。

甲骨文的研究，都是胡說八道。

过去几年我們往往下定决心要找奴隶，所以竟有由甲古文中找到滿山遍野的奴隶的例証，这也算有志者事竟成吧！

解放后的書，內容貧乏，没有邏輯性，看了使人思想僵化，……。解放前的書，从业务观点看，倒有些好書。

現在的学者都說不出什么来，現在对象"反杜林論"那样的書，研究的人没有了，只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有人研究，但没有一个人懂得恩格斯这本書，相反，在資本主义国家却有人懂，中国只有費孝通、吳景超、潘光旦等四个半人懂。

中国学者遺憾的是没有經过資本主义的訓練。

聞一多有高深的造詣，有兩个原因，一是他在清华毕业，清华有美国教授，二是他留过美，学过美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所以聞一多是中美文化的結晶。

学理工的留学生願意回来，但学社会科学的人不願回来，国家希望他們回来是因为我們老了，后繼无人，国家怕中断，所以要資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来。实在，留学生不用顧虑，回来后唸几本馬克思主义就可以了。

（四）攻擊黨領導的歷次政治和社會改革運動

思想改造：

中国知識分子过去一个时期一般是一言不发，或是发一套假話，实际也等于一言不发。中国知識分子不发言在世界上占第一位。

苏联对旧知識分子是摧殘的，所以科学是落后的，中国好一些，但也有問題，举哲学家的情况看，高級知識分子写东西很困难。

四岁小孩因为当众檢討就不願与別的小孩接近了。精神虐待（按：实际是誣蔑思想改造），对儿童，对青年来說心灵上的伤痕是不容易去掉，甚至終身不能忘記。

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

实在中国农民的遭遇远不如納粹統治下的农民苦。

土改时，有些工作做得不好，发动落后，把二流子都提拔上来，后来又要返工。

各国土地一向均为国有，在土地所有制問題上，实际并没有多少文章可作。

无論什么时代农民都是善于消极抵抗的，統治阶級只要叫他感到不滿，他就会怠工、破坏、故意減产、除了自己糊口，顆粒无余，所以农民一般是不能奴役的。

工商業改造：

这是兩千年来又一次浩劫。

抗美援朝:

以后不应該再說美帝是紙老虎，美帝的生产力是很大的。

反對批判資產階級思想:

現在中国批判資产阶級思想，实际中国没有資产阶級思想，只有地主和小資产阶級思想。

胡适是杂家， 胡适思想在中国没有影响。 胡适没有什么可以批判的，不值得批判。

批判胡适的人都不懂胡适的文章。

現在所有批判胡适的文章，都是形而上学的，現在的書也都是形而上学的。这些教条主义的文章，外国人看到了要笑。

胡适对大陆上的問題看清楚了。胡适写了一篇反駁的文章，没有譯成中文，因为人們不了解胡适的原意，而且胡适还击的很有力，无法駁斥。

百家爭鳴的方針:

鳴放政策是正确的，但是晚了一些。

馬克思主义的思想領导这是不成問題的，是否可以不要这样提。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

听說这方針在領导人中間也搞不通，意見不一致。

（五）宣揚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和資產階級社會科學

西德比东德生活水平高，英美更高，苏联比英美还是很低的，捷克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但仍比不上西德，更比不上英美。

美国农民是自由的，没有地主压迫。

欧美由于吃的好胃口小，中国人淨吃粗粮胃口很大。

今日的世界，是一个欧美重心的世界，这是无可否認的事实，所以我們不能完全摆脫欧美的影响与欧美勢力而独創自己滿意的新世界与新文化。

美国現在没有爆发革命，是因爲美国工人生活好。

近代民主就是資产阶級民主，廿世紀是資产阶級民主的最高阶段，

人們可以随便罵艾森豪威尔。

社会主义是民主集中制，英美是集中民主制。

大家都知道現在資本主义国家中的东西 ， 实在很丰富，二次大战后，美国在学术上属於絕对領导地位。战后最少英美在經济上称霸权。

联合国經济社会委員会所属的教育、科学、文化机構，目前正在着手編輯一套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发展历史，將来正是此方面最完备的参考書。

那个国家先进就学那国文。在会上我很难說話，說美国科学先进，要学英文，那么別人就不能理解我，所以只得繞个圈子說。

看你很聰明，要学英文才有前途。

官僚主义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在資本主义国家里不可能想象有官僚主义，在中国、苏联則特別严重；教条主义也是因为落后才产生的，將来資本主义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时不可能有教条主义。

（六）反蘇言論:

苏联没有一个眞正社会科学家，没有一个眞正了解馬克思主义的，例如苏联翻譯的“共产党宣言”，許多地方譯錯了，没有眞正了解馬克思原意。

苏联没有一本眞正学术价值的書，要学世界史，只有学英文，英美有許多好書。

苏联的書在英美学者来講，不值一駁，所以看都不看。

苏联没有东西可学，特别在社会科学方面，在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大学曾經十七年没有历史系， 旧俄的极少数历史学者， 又都跑到国外去了，所以我怀疑是中断了，没有什么东西。

米高揚报告（按指苏共二十大会上的报告），把苏联二十多年来全部社会科学都否定了，这看法当然对，的确苏联没有什么。

苏联的社会科学一无成就，自然科学方面只是物理学有成就，其他学科，則只是个别方面先进，生物学特别落后。

苏联的大百科全書，不如資本主义国家的好，没有大英百科全書材

料多。

苏联自然科学趕不上美国，社会科学更差了，实在驚人，……。苏联原子能超过英美，主要是因为扩軍备战。苏联原子能成就主要是得于德国人的东西。

我眞不敢相信苏联农业方面超过美国。

苏联在社会科学問題上做的很不对，革命后把旧的傳統全打断了，只能在馬克思主义教条框子里套。

苏联社会科学比英美落后半世紀。

苏联的历史書沒有什么学术价值。

我們学习苏联很困难，因为俄文中保存了拉丁文的困难因素。不是俄罗斯民族就学不好俄文。

因俄文写出来的文章意思識不清。

留俄沒什么可学的，学社会科学是否可以到资本主义国家留学，这倒是个新問題。

苏联教条主义最严重，批判教条主义后，只是去掉括弧、引号，把引話改成自己的話，其他仍是一样。

苏联教条主义严重，对旧学者摧残，大部分的旧学者在国内战争期間或肅反时都跑了，所以社会科学不发达，而批判教条主义后则因为过去学的都是教条主义，所以潛力不大。对以后的期望也不大。

教条主义的产生是由於知識差。

学习苏联先进經驗，实际上不是什么先进經驗，而是承襲帝俄的，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教研組倒是苏联創造的，到現在我还想不通有什么作用。

科斯明斯基有成就，但这人也是帝俄时代培养的，在帝俄时受的基本訓練。

苏联在二次大战后改变宗教政策是因为东歐民主国家对宗教重視，所以苏联也改变，为的是抓住他們。

斯大林象教皇。

斯大林太殘酷了。

列宁在沙俄的学校上了点学，列宁不早死，苏联社会科学不致中断，斯大林沒有什么修养，只是專断。

目前沒有什么科学家，列宁最多算半拉，只是搞的革命理論。

斯大林后期兩本著作，是赶任务写的，片面性很大。

德、意虽垮，而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歐各极权国家…… 人民完全成为国家的工具，毫无个人自由可言，个人人格的价值几乎全部否定。

苏联是代表原始时代的宗教性的大一統主义。这是一种排斥異己的原始宗教作风，自以为善，……其中有极其濃厚的"代天行道"意識，一切的辯理都是工具与藉口，眞正的原动力是神秘的信仰与精神的冲动……，苏联的利益高於一切，任何妨害苏联的行为都是"褻瀆神明"之罪，可能时必須徹底的打倒，……。这样以苏联为中心的，富於神秘性的世界主义……是使普世人心惶惶……。

苏联……对中国则始終不肯放松，外蒙完全席捲以去，新疆也在掌握之中，……。自日本投降以来，苏联除在外蒙与新疆势力仍旧且加强共控制力外，并代日本而进入东北与朝鮮北部。

（七）鼓吹戰爭，宣揚法西斯主義

和平运动只是一种插曲。有了战争社会才能进步。

战争是列国必不可免的現象，几乎可說是自然的現象……我們甚至可称战争为正常，和平只是旧战争后的休息时期与新战争的准备时期。

战争与人民願不願意打并不发生关系，即使有关系，也不起决定作用。

国际間兩大壁壘之間的空气总是很紧張的，双方都时时刻刻准备兵戎相見。"武裝和平"即是列国和平的絕妙形容。和平是外表，武裝是实际，迟早必有一个問題使兩大壁壘火併，……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在历史的透視中，和平运动只是一种插曲，是战后人力疲乏心理疲乏的临时反应。临时的疲乏一过，新战争的醞釀又起，不出几年就又来一次大放血。

在人口过剩的根本問題不能解决之前，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剿不胜剿，撫不胜撫，非到天下割据，各地混战，相砍相杀几十年以至百年不可。

大乱的結果必是人口的大批杀死、餓死与病死。等到人口減到相当的程度之后，減少到財富分配即或不均亦无飢寒危險的时候，天下就又太平了。

（八）其他

匈牙利这一乱，几万人都跑到美国去了，去的都是匈牙利的精华。

匈牙利事件只能在匈牙利发生，不可能在中国发生，中国人过去生活苦，匈牙利过去生活很好。

如果中国出了匈牙利事件你們參加不?（雷問学生团員，学生說：当然不參加。雷便說：那可就脫离群众了。）

× × ×

戚繼光抵抗倭寇，阻止了中国資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 × ×

中古人信宗教，人死后到天堂，极乐世界，現在人民迷信社会主义，認为到社会主义什么問題都解决了。这只不过宗教是形象化的形而上学，現在概念化的形而上学，所不同的是过去搬出了上帝，現在没有搬出上帝而已。

× × ×

現在东歐很多青年人信了基督教，是因为我們用形而上学的批判方法，故不能有力地打击宗教，所以很多人反而信了基督教。

耶穌会是重質，組織健全，消息灵通，梵蒂岡是个人口多到四亿的大帝国，中国应該認識它，并且同它締結深刻的关系。

× × ×

雷海宗曾指示右派分子譚天榮：你要在自然辯証法上找岔子。

我的立場已經改變了，我在政治上是擁護黨和社會主義的。

到死我也沒有辦法承認是反黨的。

我没作过官（雷海宗曾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委員），只是个教授。

我不是反動的，是受右派分子的利用和影響。

現在有些人是有意識反党的，有些人是没有意識的反党。

雷海宗在天津教授們關於"百家爭鳴"的座談會上發言

人民日报編者按：本报編輯部在天津邀請十位教授座談关于进一步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問題，这里发表的就是这次座談的記录。座談的发言不能像写論文那样严密，但是我們仍然可以从这些发言里看出知識界的一些思想动态和他們迫切关心的一些問題。其中雷海宗先生对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我們在他的发言的后面加注了一些意見，希望引起大家的討論。

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但是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1895年的地方"

資料不够，使許多人不能爭鳴。对百家爭鳴，虽然可能有顧慮，但从天津史学界来說，因有顧慮而不敢爭鳴的还不多，主要是資料太少无法鳴。我們搞世界史的比其他部門材料更少。

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有一个根本問題：社会科学是随資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資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真正的科学；馬克思恩格斯是在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方法和新观点为无产阶級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这里就产生几个問題。一个是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資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經历資本主义，解放前虽向外国学了一点，很少，只是点綴性質，也没学透徹，在中国人的社会意識里没有这个东西。即或有少数人比較透徹的接触到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也是从国外留学时接触的，回国后就落后了，接不上去。过去只是为了点綴，今天要求我們繼承过去人类的文化遺产，并在这个基础上来发展新的社会科学，不研究这些就不行。从这一点来看，資料問題就更大了。有些人認为我們只是在解放后才和資本主义的社会科学隔絕，其实过去也并不透徹了解，而今天要求我們比解放前有更多更透徹的了

解。

另外，对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論上是一致的，承認馬列主义应該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別問題上有新的提法，但他們主要談当前革命問題。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經驗，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說，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馬克斯恩格斯生平也是經常修改他們的学說，他們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門的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們就認为他們已解决了一切問題，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 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認識。我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課补上。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的問題，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問題，工作艰巨得很。解放以前对資本主义社会科学已經不是全面掌握，最近新訂了一些資本主义国家的刊物，好多問題就不了解，看不懂。資本主义国家有些社会科学家是反动的，如凱恩斯，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但今天也有許多資本主义社会科学家并不是有意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有的只是一个認識問題，不直接牽涉到立場，只是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不同。当然，分析到最后，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都是有立場的。另外历史問題，如希臘史，六十二年来发現了好多材料。1890年在埃及发現的雅典宪法，可以說明好多問題。这本書恩格斯未看到，他如果看到，他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書中在有些問題的提法上就会不同。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在理論上大家都这样說， 在实踐上却認为社会科学是停留在1895年的了。

我和郑天挺先生不大写文章主要是材料不够。过去学的好多东西，現在没有用，今天有用的东西，过去没有学，需要从头学起。过去我們买了不少資本主义国家的書，但是有用的書没有买。尤其是研究世界史書太缺乏了。目前我們图書館要买書，經費又受限制。

对年龄大一点的人来說，他們有他們几十年的习惯，在研究一个問題时，得掌握全面或比较全面的材料才能講話。今天有許多問題是值得談的，可是不掌握材料就没法談。因此不大量地把过去没有买来的書买到，进行研究就很困难。我們要体会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問題的方法，而不是光揣摩他們的結論。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結論，如果他們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作結論。如果拿六十二年前馬恩研究希臘史时的結論来解决中国古代史問題， 这当然解决不了問題，而只会把問題搞得越来越糊涂。

人民日报編者注：雷先生認为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而为了发展社会科学，这就需要反对教条主义，这个意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雷先生認为列宁对于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別問題上有新的提法”，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違反了事实。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这是說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論，而不是說关于个別事实的个別論断。列宁正是在社会科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論方面，首先是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專政，关于社会主义建設等基本理論方面，向前发展了馬克思主义。没有这些发展，没有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斗爭，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各国共产党人对于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都有他們的貢献。我們中国共产党人，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眞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踐相結合，克服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 也使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 因而能够在中国实現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 而雷先生所說的关于六十二年来古代史的发現，却只是涉及到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个別論断。古代史的研究者当然应該根据新发現的事实，去补充以至修正那些个別論断，但是补充和修正这些个別論断，并不影响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論。这是我們的看法，希望大家討論。 （原載1957年4月21日22日人民日报）

雷海宗給人民日報的信

編輯同志：

讀到21及22兩日你报“天津的教授們关于‘百家爭鳴’的座談”一稿及我的談話后的“編者注”。我对于“注”中的話完全同意，我也是

認为最近六十二年来，結合革命运动的发展，馬克思主义是不断地在发展的，我只是願意提出我們过度忽視了最近六十二年以前的人类历史几千年的經驗教訓的进一步研究。我的談話中"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問題上有新的提法，但他們主要談当前革命問題，"下半句就是指的象列宁关于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專政一类的理論，上半句"个别問題上有新的提法"即指象列宁对于封建社会所下的更清楚的定义之类。这后者只是"个别的"，而不是"主要的"，他們对于过去的人类經驗没有时間多去談論，只能在极"个别的問題上"說几句話，他們談的有分量的話"主要地"是有关当前革命的問題，而我們一般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馬克思、恩格斯所树立的結合过去几千年人类經驗的社会科学部分又不肯体会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質去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使社会科学的这一部分一直处在停滞状态之中。

这个意思，在談話中我沒有說清楚，除我自己当負責外，我当时的一种想法也有关系。在座談会的半个月以前，我在天津参加了另外一个会，在会上曾发言，与座談会上的发言主旨相同，我在座談会中想避免不必需的說話重复，把自認为不言而喻的話就用半句話帶过去了。在那个会中有发言稿，現把原稿附列于后，作为座談会发言的补充：

我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現在对社会科学工作发表一点意見。

在科学文化事业的大环节中，社会科学恐怕是我們最弱的一环，而这个最弱的一环又极少引人注意，好似它是可有可无，无关重要。据北京方面一个"工作会議分組討論中提出的一些主要問題"这一文件中所載，在"关于科学工作問題"部分有簡單一条如下：

> "目前社会科学工作很薄弱，同国家建設特别不相称，应該采取什么有效的步驟来加强它？正确地开展学术批評和討論是党对科学領导的重要方法，在这方面能不能提出几条方針？現在不少社会科学家感到空虛，但不少社会科学家也还有不够虛心和刻苦的情形，党应該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帮助他們？……"

这一段話很概括，講到人的問題較多，在会議中对社会科学本身的問題究竟具体地、全面地如何提法，我不知道。对于人的問題我沒有什么特别的看法，但我非常同意这段話一开头的总的提法。这个情况的确与我們国家的建設特别不相称，不相称到令人难以想像的程度。談得更具体一点，对于我們在高等学校作社会科学教师的人来說，我們一般地都很难滿足青年学生的要求。他們要求內容充实、面面俱到、有解釋分析、既有骨头又有血肉的思想性强的講演；但我們一般只能粗枝大叶地，有时甚至只能空空洞洞地講演一番，而因为簡單空洞，思想性往往不知从何談起。这是就对內而言；对外，与敌人作斗爭，研究批判資本主义国家資产阶級学者的社会科学时，我們对他們几乎是一无所知：作战总要知彼知己，我們完全不"知彼"，也就无法談到"知己"，有时对他們乱批判一通，等于赤手空拳地向黑暗中乱打一陣，旣打不中敌人，自己也枉費了力气。最后，这也就說明了为什么百家爭鳴的方針政策提出来已滿一年之后，在多数社会科学部門中或是根本沒有鳴起来，或是鳴得无精打采。

关于爭鳴而鳴不起来，有人認为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思想复杂，顧虑太多，不肯爭鳴；这就是說，他們是能鳴的，只是不肯鳴。关于这一点，就我所熟悉的同行的人来說，这种情况虽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最少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大家都感到沒有本錢，鳴不出来——不是不願鳴，而是不能鳴。有人常批評年岁較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說，他們解放前文章也写的不少，有时也相互爭論，現在为何一字不写？这个疑問很容易解答。在解放前，为一个字，为一句話，为不相干的一个小題目，可以写出几千字以至上万字的文章，并可展开爭論。这虽不見得都是无謂之爭，但鑽牛角尖的成份的确不少！今日这种文章不能再写，不是不敢写，不是怕人扣帽子，而的的确确是对这类文章不再感到兴趣。今天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自己要求甚高，意义不大或談不到甚么意义的文章他們不願再写。所謂有意义的文章，就是在掌握充分材料的条件之下，尽自己力之所及用新观点新方法（当然是新立場）写出来的东西。但問題也就在这里了。观点方法不見得完全有把握，但每个人都願意試一下，問題是在材料。象經济科学工作者所遇到的保密問題，是大家已知

道的，不必再談。以历史学而論，过去所會經注意的材料，今日一部分已沒有用处，今日有用处的材料，有相当大一部分过去沒有注意或注意得太少，一时也來不及全部理出。这还是就中国史來說。講到世界史，問題就更大了：与其他近代社会科学一样，在世界范圍內所要知道的关鍵性的和比較專門性的东西，大部分在国內很难找到，我們的图書舘，全国所有的图書舘，有关这方面的眞正有用的書，实在少的可怜，要凭現有的一点有用的書去作出今天看来有意义的工作，并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在解放前，社会科学賦有濃厚的半殖民地性，主要地是发生点綴作用，沒有踏实的根基；人少，書也少，書絕大部分都是課本和普通参考書一类的書；今后要作工作，大量采購解決問題的書是一个絕对必需的条件。

但問題还不只此。无書当然沒有办法，有書也不是全部問題馬上就解决了。我們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貧乏，所有的东西几乎都須从头作起，不是短期間所能奏功。在人类历史上，成为科学的社会科学是到資本主义时代才出現的，我們必須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們新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科学。資本主义的这些东西不能拿来就用，但是又不能不用，因为除此之外几乎沒有可用的东西。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年前，站在无产阶級革命的立場，在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总結了过去几千年人类的 历史經驗和科学知識， 初步树立了 新的社会科学。恩格斯死在1895年，到現在已六十二年，在这六十二年之間，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积累了很多的革命經驗，丰富了馬克思主义；就中国最近的情形而論，我們党的兩篇論无产阶級專政的文章和毛主席方才提出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报告，都是这方面的突出貢献。在这一方面，馬克思主义是一直不停地在发展的，新的社会科学是不断地在增加內容的。 但社会科学还有另外一面。 在这另外一面，在不断深入地、日漸具体地总結人类全部历史进程中的經驗教訓这一方面，这六十年来是几乎完全处在停滯狀态之中。馬克思、恩格斯經常掌握当时世界科学、尤其社会科学的一切情况和全部成果。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

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認識和新的解釋。但这些，对我們社会主义陣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說，是等于不存在的，我們今天仍滿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認識条件和資料条件下对問題所說的个別的語句。講我們自己的本行，例如馬克思关于資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說法，我們基本上仍是一切遵照办理，并且在談中国史时，也尽量去找材料来印証在一百年前的条件下他关于欧洲史所下的論断，无証据处硬要找証据，实在說不通时，就說中国是例外，好象我們的祖宗在創造历史时曾經故意地不遵守历史发展規律似的。我們似乎不願意想，馬克思若在， 他今日对于欧洲过去的历史，在今天的条件下， 究竟如何看法。 我們是如此地不去思考， 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社会科学界也是如此地不去思考！ 无产阶級的国家、 社会主义的国家当以全部人类文化精华的繼承者自豪， 但我們不肯繼承这一份按理属于我們的遺产， 反倒把它拱手讓給資产阶級学者去利用， 而他們时常去濫用。 但当他們去濫用时，我們也束手无策，也指不出他們的錯誤，因为我們不掌握材料。

这个极不正常的局面， 今天应当糾正， 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我們的党提出百家爭鳴的方針政策之后，現在也有条件糾正。如使具体作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商討，但首先必須大家对整个問題取得比較一致的認識，認識到問題的严重性。国家在經費的分配上，在人事的調配上。可以对社会科学多注意一些。我們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必須加倍地努力。努力学习，努力經常地自我改造。如果象会議中所反映出的，有人感到空虛，就要赶快跳出空虛的境界，我們是有广闊的世界可以活动的； 如果有人不够虛心， 当知我們还薄弱得很，刻苦鑽研尚恐不能有成，沒有絲毫可以自高自大的理由。毛主席在他的講話中，提出过去一年是偉大轉变的一年，中国社会已有了新的面貌，我們每个人应当有能力、有信心去发展社会科学，适应改变了面貌的中国社会。

雷海宗 1957.4.22

（原載 1957年4.28 人民日报）

雷海宗講述他對世界史的一些問題的看法

人民日报特約新华社專稿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2日在天津市几个学术团体联合举办的爭鳴講坛上，以“世界史分期和世界上古、中古史的一些問題”为題，向学术界和高等学校的教授、学生发表了講演。

雷海宗教授首先从生产工具的发展說起，他認为从有人类以来，生产工具的发展有四大阶段：第一阶段为石器时代，第二阶段为銅器时代，第三阶段为鉄器时代，第四阶段为机器时代。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沒有爭論；第四阶段是資本主义社会，后来是社会主义社会，也沒有爭論；問題在于銅器时代和鉄器时代，也就是資本主义出現以前阶級社会这一段。他認为經典作品对这个問題談的很少，唯一較有系統地談过的是馬克思。馬克思根据当时欧洲科学所掌握的材料，在“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說来，亞細亞生产方式、古典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以及現代資产阶級生产方式，可以看成为社会經济形态发展中的几个演进时代。”恩格斯、列宁也在几个地方談到这个問題。他們对亞細亞生产方式一般的不提了。这是因为不仅在一百年前关于这一段知道得太少，就是在五十年前知道得也不清楚。比如現在掌握的埃及、印度上古的材料，絕大部分在一百年前沒有，欧洲学者一百年前对中国上古史則等于完全不知道。而今天掌握的亞細亞生产方式的材料比較多。因此，他認为应該根据新的材料重新考虑这个問題。

雷海宗教授指出：按照过去一般习慣，划分社会阶段时往往把銅器时代和鉄器时代的前一段称为奴隶社会，把鉄器时代的后一段划分为封建社会。他認为这样划分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把生产工具基本上相同的时期看成是兩个社会阶段，兩种不同的生产工具时期看成是一个社会阶段，是違反生产工具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的。这样就是只在口头上承認生产工具重要，具体問題上又忽視了它的重要性。至于說生产力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有一定生产經驗和技术并使用生产工具生产物質資料的人，他認为在研究历史时不必过分强調，因为在銅器时代

和鉄器时代，許多經驗、技术，今天沒人知道。

雷海宗教授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对銅器时代和鉄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社会面貌进行了分析，說明奴隶制度在世界史上是不存在的。他以銅器时代发展相当高的巴比倫为例：当时巴比倫除了一部分土地由王直接掌握外，另外一部分是私有制，土地租佃制相当普遍，自由身份劳动很多，奴隶劳动反不重要。奴隶、自由人界限不严格，奴隶不但可以和自由人結婚，还可以和貴族結婚。主人对奴隶不能生杀，奴隶多是外来的，本族的債奴劳动三年后仍可回家，这实际上是一种还債的方式。当时保有奴隶的王公、貴族是把奴隶作为他們的家族成員。在罗馬的“家族”二字，拉丁文的原意就是包括奴隶在內的。当时的奴隶大部分是寄生阶級，人民中只有少数的奴隶从事生产。因此，如果把这种制度叫奴隶社会，那末，对奴隶社会的定义就需要重新考虑。雷海宗接着談到鉄器时代，奴隶制虽然有了发展，但奴隶在生产中所占地位并不似一般想象的那样重要。不仅在希臘絕大地方是如此，即或是有着近二百年历史的典型奴隶制度的雅典，奴隶在农业生产上也不占重要地位。当时沒有奴隶起义，沒有奴隶与自由民間的斗爭，也沒有奴隶与統制者的剧烈斗爭。雷海宗教授認为只有罗馬的情况在世界史上是一个例外。罗馬当时經常向外侵略，每次俘虏大量的人，因此，才有了大規模的奴隶制度，这种情况只有海上国家才有可能产生。

雷海宗在分析了希臘、罗馬等国情况后，提出他对銅器时代和鉄器时代社会性質的看法。他說：我們一直尊重馬克思，为什么在这个关鍵問題上忽視馬克思这个論断？馬克思提的亞細亞生产方式这个名詞可以不用。因为这不是个地点問題，叫亞細亞生产方式也可以，叫其他生产方式也可以，但这是一个时代，是个独立的社会阶段，与后来的古典社会（后来叫奴隶社会）根本不同。“奴隶社会”也就是鉄器时代前一段，我主張仍用馬克思一百年前用的名詞，叫古典社会，不叫奴隶社会。因为高度发展的奴隶制度只在雅典、罗馬很短时期有，他在說明使用奴隶与奴隶社会不能混为一談时举例說：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大量使用奴隶是罗馬；第二次是西欧国家大量使用非洲人作奴隶，而这已是十六、十

七、十八世紀的事情，如果說这是奴隶制度的殘余，也不能有这么大的殘余，这也可以說明就全世界的历史来說，没有奴隶制度这个社会阶段。

（原載1957年6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見历史教学1957年7月号）

雷海宗在中共天津市委統戰部召集的座談會上發言

九三学社天津分社付主任委員雷海宗在发言时先举出了学校教育中的兩个事情說：我有个老朋友的一个四岁小孩，在幼儿园中犯了錯，被罰站在小朋友中作檢討。这小孩已經养成一种习惯，一回家就关起門来自已玩，不願意和別的小孩接近。我知道这事情以后，我就想，假如十五年后，他到大学念書，做我的学生，他是个怎么样的学生呢？他如果思想作风有問題，我是否还忍得給他講呢？还有一个初中毕业生，学习成績很好，但是他不大习惯于热鬧的場面，別人对他不了解，在保送升高中的时候，許多比他学习成績差的同学都得到了机会，他没有得到，于是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天津，到別的地方上学去了。现在，这个十几岁的学生，除业务学习外，对其他方面表現得非常消极、灰心。我也想三年以后，他很可能成为我的学生，这样的学生，我又能給他講什么呢？旧社会中，在教育方面存在的問題很多，今天不談了。而从上面講的这兩个事情来看，他們都是在新社会中成長起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这是我們教育界思想作风的問題。我們教育人的人，教育人的党遇到这样的問題应該首先檢查自己。我对心理学、教育学是外行。但是，我感到解放几年来，我們进行教育的时候，对儿童、青年的年龄特征注意得太少，不从实际出发，只从籠統的概念来考虑問題，这样的結果，无論別的方面是怎样正确，要使儿童、青年成比較完滿、健康、全面发展的人材是困难的。今天，在教育工作中不准有体罰，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没有了对儿童的肉体上的虐待，却没有注意到对儿童精神上的虐待；肉体虐待对孩子們也許几天就忘記了，但是，精神的虐待对儿童、青年来說，心灵上的伤痕是不容易去掉的，甚至終身不能忘記。我覺得这是因为解放后对心理学、教育学的遺产重視不够。心理学、教育学发展成为

現代科学，已有八十年的光景，当然其中有許多东西是不正确的，但是也积累了許多知識，不能象目前这样一笔抹煞。今天，国内心理学家、教育学家不少，但是他們的宝貴知識没有得到重視。今后党和政府有关部門应該多注意一点过去积累下来的科学知識，这对改进今后的教育工作是有好处的。

（原載1957年5月22日天津日报）

筆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九三学社天津市分社副主任委員雷海宗

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問題，說来慚愧，我过去实在是关心不够，在这个方針提出之后，我長期没有給予应有的重視，只是到最近才开始对这个問題多作观察，多加思索。直到如今，实际的感受仍然談不出許多，只把我对这个問題总的看法說一說，或者有供党和非党双方今后參考的一点价值。

旧日的統治阶級，习惯于发号施令，一般的人民則习惯于唯命是听，不願听时則消极抵抗，甚至消极破坏。至於知識分子，在旧社会"高人一等"，他們或者參加統治，那就成了"发号施令"者；或者不參預政治，那他們也有一套处世哲学，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对政治不滿，則发表"清議"；若"清議"不被容許，他們則可長期地把一切悶在心中。中国知識分子在不得已时的一言不发的本領，恐怕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的。这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恕我不能解釋，这只有待中国历史專家去研究說明了！但这个現象是稍知历史的人都可体察得到的。講到最近的中国，方才过去的一个时期，知識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发希望他們发的一套假言，实际那也等于一言不发。長此以往，这將成为使社会气氛、使人与人的关系趋于悪化的因素。为了杜漸防微，今后必須竭尽一切的努力来糾正这个令人驚心的局面。今后党員与非党員間的关系，必須作到相見以誠，无話不說，說錯話也比不說話要好的地步；可以公开說的就公开說，没有公开說的条件的就私下說，該說的話必須說出。只有这样，才能談到有內容、有

意义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以上也就等于說，党与非党間必須交朋友。但請不要誤会，我們不是主張发动一个交朋友的运动，不是希望所有有联系的党与非党人士都成为朋友。交朋友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过去傳为美談的刎頸交，普通都是兩人，桃园結义也不过三人，一个人一生若有三五个眞正的朋友，那个人也就了不起了。交朋友有严格的条件。中国一句老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必須知心，才能作朋友。近年有党員与非党作朋友的嗎？——相互間可以毫无拘束地談話的朋友？可能有；但我們很少听見說过。我們要求不要太高，只求在一定时期內，每位党員能交一个非党的朋友，或恢复入党后丧失的一个早年朋友。仅此而已，仅此已不簡單。

过去一个时期，为何会有那种不健康的党与非党关系呢？在非党方面，原因已如上述，不必再講。在党方面，也有它历史的原因。在过去長期的軍事流血斗爭中，軍事不必說，政治措施往往也必須即决即行，当时没有"坐而論道"的条件。这自然就养成领导革命的党員在一般事务上自断自行或自断而指令他人执行的作法，初解放的几年，解放前所遺留下来的一些必需斗爭的工作仍待完成，所以一时仍旧沿襲旧日的作法。在解放后的城市，这当然就更加深了知識分子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想法和相关的"守口如瓶"的作风。

实际，过去在老区，党是經常地走群众路綫的，但一般地只是走农民群众的路綫，对于城市群众，尤其知識分子群众的路綫，一般党員是不习惯于走的。用走农民群众路綫的方法来走知識分子群众的路綫，往往不能收到象农村中所收到的效果，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对于农民，只要滿足了他的土地要求，并帮助他在政治上翻了身，其他的道理都很容易講，他一时想不通的也很容易叫他想通。解放后知識分子也經过了极大的改变，但他的改变与农民的改变根本不同，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質也不同，思想意識也不同；对知識分子如果象对农民那样地說服教育，他初則惶惑不解，最后則你要他怎样就怎样，实际什么問題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以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或正在成为过去的过程中。在过去，

这都有它的历史原因，也有它的一定历史的需要。但当初正确的事，繼續作下去，可能就成为正确的反面了。毛主席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全体人民眞正积极当家作主的課題。这个課題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党与民主党派、政府与人民、领导与群众都必須作一番艰苦的，并且可能是相当長期的思想改造的自我斗爭。大家对新局面和新要求都不熟悉，或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抵触情緒，或者怀疑的情緒，是相当普遍的。慣于发号施令的，一旦要他遇事与人商量，固然不是易事；但慣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要他一朝就能积极地关心、积极地參加一切应当关心、应当參加的事，換言之，要他言行一致地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也是好不簡單的一件事。必須双方共勉、互勉，才能逐漸地都养成遇事商量、有見必說的毫无心理隔閡的亲密关系。只有如此，人民內部的矛盾才能随时发現，随时解决；只有如此，才算完成了"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历史任务。

（原載1957年5月23日天津日报）

經濟系教授　傅筑夫

（一）攻擊黨的領導

南大經济系是一团糟，毫无成績，也不可能有成績，老教授不能发揮潛力，受排斥。南大經济系太特殊了，有一股强烈的暗流，并不断在增長，經济系完全籠罩在黑暗勢力之下。要坚决跳出南大这个火坑。南大是"蛇窩"。我在南大是浮在表层，有随时被整的可能；在人大則滄海一粟，有什么事不会輪到我的头上。

教学改革是领导上要排斥我們；培养青年教师的新生力量，是要把我頂走。

（二）誣蔑、攻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和歷次政治運動以及各項措施

没有自由的民主就是不民主。我們的选举制度，只在被选人上圈个圈，是不民主。在选举票上划划圈是形式主义。

引用英国海依克一句話“計划会造成由丰富到貧困”。（右派分子黄公度曾說：“計划經济会产生官僚主义”。）經济自由，政治民主，才能发展生产。社会主义計划經济除了国防巩固以外，没有什么优越性。

“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国不能搞，因为太穷了，人口太多了，資金没法办。”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以后，农民生活很苦。农民苦得比你（对右派分子黄公度）所想象的还要苦。物資供应紧張是計划不好，是統購統銷搞糟了。

欣賞千家駒以資本主义刺激社会主义的說法，应該恢复資本主义的自由市場。对外援助应該减少，最好关門建設。

我是抱着抗拒态度来对待历次运动的，对于历次运动，由于多少触及到我一点，就引起我的仇視和不滿。

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严厉的批判，因为反动立場未变，觉得不得了，內心抗拒不滿。覺得思想改造伤了我的自尊心。

總覺民在三反中被斗，是滕維藻利用运动，打击陷害。

肃反中滕茂桐被斗，心內有兎死狐悲之感，很害怕。自己的爱人因她弟弟的問題被斗，所以对运动不滿。

（三）反對、攻擊和誣蔑馬列主義經濟學企圖恢復資產階級經濟學

馬列主义政治經济学只停留在資本論阶段，也就是說資本論出版以后，馬列主义的政治經济学没有什么发展；社会主义部分根本不成东西，因为是在斯大林压制之下；而資本論本身第一卷和第三卷又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这样說来，馬列主义政治經济学就完全没有什么价值了。

馬列主义政治經济学是一套邏輯謹严的空架子；对于具体的財經工作，没有什么指导意义。

馬列主义經济学不能指导实际，因为現代的資本主义的实际情况与

馬列时代不同了。雷海宗的馬列主义停滯論有道理，季陶达的文章是从政治經济学上抄来的。（按当时季陶达同志曾撰文駁斥雷海宗的謬論）

資产阶級經济学了不起，我們要“补課”；資产阶級經济学很有用，馬尔薩斯人口論不正是說明中国的人口問題嗎？

象雷海宗这样的人才算有学問，才不算教条主义者。黄公度有学問，是搞了几十年計划經济的專家，黄的工資定五級太低，是南大不懂学术水平。

今天的科学研究主要是材料問題，立場、观点不成問題。

人类的历史是阶級斗爭的历史的說法是錯誤的。

馬列主义政治經济学的工作者是“教条主义”，“不学无术”。季陶达曾在苏联讀过書，但連俄文二、五格都弄不清（按这是黄公度捏造）。季陶达不学无术，不懂科学研究，不但不懂旧的經济科学，对馬列主义經济学也同样不行。他教了多年的政治經济学，都是根据列昂节夫一本小書，資本論念过没有都成問題。教經济学說史是用沈志远的本子，并不讓学生参考（按落后学生康国雄捏造）。季所以能在經济系，并不是有能力，是黄老（松齡）走时关照天津市委，說季不要动。

（四）對蘇聯的誣蔑和攻擊

苏联的輕工业不如重工业，农业落后。苏联的資金积累是剝削农民来的。苏联消費品缺乏，苏联百物公司貨架上都是空的。即使有貨，物价高，工人也买不起。

苏联社会科学不行，特别是經济科学落后；苏联社会科学不如自然科学；苏联經济学不发展，是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窒息了独立思考，不可能有創造性的見解。

苏联經济科学落后，內容空洞，邏輯性不强，苏联的外国經济史教学大綱要不得。（1956年在北大討論編写外国經济史时，就曾說苏联的提綱看不出优越性。）

苏联派来的專家不都好。專家很多是大学剛畢业；华东师范学院請一位地理專家，許多教授去听，結果大失所望；人大苏联專家批判凱恩

斯的文章很不行，沒有击中要害。

苏联社会科学不如中国。1956年听广州中山大学參觀团一个姓吳（伍）的人談："12年內赶上世界先进社会科学水平，如果是苏联的水平，我們早已赶上了"。傅很欣賞这种說法，并告訴了黄公度。

傅筑夫的發言

各位代表：

我是南开大学經济系教授，同时又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經济史教研室教授，我在这兩个重要的工作崗位上都犯了严重的錯誤，我身为人民代表，而却是一个右派分子，作了破坏人民的事业，我今天是以万分沉痛惶恐和慚愧的心情，站在这个庄严的講壇上来向人民請罪，来交代我的严重罪行。

在大鳴大放期間，当各地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我也响应了这个形势，利用党整风机会，藉帮助党整风名义，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不过方式稍微与别人不同，就是我不是从正面进攻，不是直接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論、政策等等公开加以誣蔑，而是采取了一种更隐蔽的兩面手法，并在发表了一些正面的意見掩盖之下，从攻击一个領导干部——南大副教务长滕維藻同志开始的，另外还对一个非党領导干部經济系主任季陶达先生进行了惡毒的誣蔑，从而对南大經济系、經济研究所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誣蔑了南大整个党的領导工作，給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損失，我的罪行是严重的。

现在因时間关系，我只能把組織上交代过的事实經过簡单交代出来。

由于我对党一直是仇視的，对南大的領导工作一直是心怀不滿的。这种仇視和不滿，并不是仅存之于心，而是經常与我有同样情况的少数几个所謂朋友——黄公度、楊学通、潘源来、有时还有鮑覺民等，拿这些仇恨和不滿当作私下談話的題材，以互相交换这种仇視和不滿，加强这种仇視和不滿，我們把教学改革对資产阶級經济学应有的否定，故意說成是領导上要排斥我們；把培养青年教师的新生力量，故意說成是要把我頂走；对于捍卫馬列主义經济学执行教学改革政策的季陶达先生，則加以惡毒的人身攻击和誣蔑，說他是不学无术，不懂科学研究，說他不但不懂旧的經济科学，即对馬列主义經济学也同样不行，說他教了多年政治經济学都是根据列昂节夫一本小書，資本論念过沒有都成問題。对于他的領导工作就更加对立敌視，由于我們根本是仇視教学改革的，就故意造謠說經济系是一团糟，毫无成績，也不可能有成績，說老教授不能发揮潛力，受排斥，最好都是来把它搞垮，这些攻击和誣蔑，不仅在我們几个人当中經常互相煽动，而且还到北京到处傳播，藉以扩大这种仇恨和不滿，并且还惡毒的認为經济系之所以糟，是由于滕維藻在幕后操縱，季不过是一个棋子，任他摆弄，于是就把对党的仇視和不滿，形象化和具体化到滕維藻身上。因而在我們几个人中間就流傳了一些莫須有的謠言，說滕在搞宗派，眞正排斥我們的就是他！

我們几个人虽然沒有什么組織，实質上是一个小集团，事实上还是以我为首。另外几个右派分子——楊敬年、刘君煌、任振威等又是另一团。

当鳴放开始后，我和上述几个右派分子，便認为时机已到，我歪曲党的整风目的，歪曲党的知識分子政策，認为这是党要改变政策，至少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領导，非交給旧知識分子不可，因为我們是內行，过去的外行領导是失敗了，我还无恥的誣蔑說："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科学不是个簡單的事，过去由于否定太多，在学术上造成了严重脫节，现在应該赶快补課了，意思就是說要由我們来补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課，整风是改变这些局面的一个机会，我們的陣地是在南大，而南大經济系和研究所又是一个有名的資产阶級經济学的頑固堡壘，我就幻想經过整风可以改变南大經济系的局面，其他右派分子都是同样想法，都是躍躍欲試，但是改变經济系局面那就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必須以集团的力量联合进攻才行，还需要扩大影响，联絡更多的人，于是便分头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謀活动。

首先是楊学通在人民大学和另一个右派分子人大民盟支部領导人之一宋汝紀策划了一个座談会，我在这次座談会中除了以极惡毒的詞句攻

击滕維藻同志，并藉着攻击滕而攻击和誣蔑南大整个党的領导工作，說是一团糟、是黑暗統治、是火坑外，还在会前帮着煽风点火，动員鮑覺民参加。回到学校后，另一些右派分子楊敬年、刘君煌、任振威等还嫌不够，还要再搞一次，我不仅贊成，并且积极策划，除了楊敬年、楊学通、刘君煌、任振威、鮑覺民，各作了多少不等的一些联絡、組織、点火等工作外，我在这次座談会中起了更大的領导作用，我不仅在暗中指揮——因上述諸人不断来和我商量，并且还积极行动，我更主动去动員黄公度、潘源来打消顧虑，要把滕維藻揭发出来。大家在会前安排好发言次序，我第一个发言，我就用上述的惡毒詞句作开場白，实际上是向党进攻的攻击令。我列举了四点所謂事实：一是說滕与别的三个非党員結成所謂"四傑"，証明他有宗派；二是黄公度教課問題，說是排斥老教授；三是成立財經研究室，說他是巧立名目，排除異己；四是鮑覺民在三反运动中被斗，說他是利用运动，打击陷害；下的結論是滕是經济系的一股暗流。这些"事实"后来知道全都是有人故意捏造的，根本是没有的。

为什么要从个人攻击开始呢？因为当时还不敢直接向党作正面进攻，采取这样隐蔽的办法，把問題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万一有什么不妥，总算是个人問題，可以有退步。至于要把火力集中在滕維藻，那只是选擇一个向党进攻的藉口，如果没有滕，也会再选擇一个張三或李四来作目标。不过选定滕也不是偶然，因为大家都是一貫仇視滕的，他过去又是財經方面唯一党員，有能力，业务好，如果要改变經济系的局面，他是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必須去掉。

这样搞是企图什么？当时在思想上明确的是要改变經济系的局面。那么，改变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要把党的領导干部推倒，由我們这班右派分子来。我們来，是为了要更好地建立馬列主义經济学么？当然不是！这样，从本質上来分析，显然是要篡夺党的領导权，是为了搞資产阶級經济学复辟，所以整个的活动，是一种有企图、有步驟、有計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

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如果只有这兩次座談会，那就完全变

成偶然，我最初也是企图这样解釋的，但事实上这不过是在鳴放期間，一貫的反党言行的一次較集中的表現罢了。实际上我的反党言行是很多的，是不能在这个短时間內一下子都交代完的，因为我是无一处不与党的方向相对立，而且还是一貫的。一切我都看不慣，我否定了各方面的成績，專門去誇大缺点，我誣蔑苏联社会科学不行，經济科学落后，誣蔑苏联派来的專家不都好，誣蔑苏联的輕工业不如重工业，消費品缺乏，物价高，农业落后等等，这不仅是有意地造謠誣蔑，而且是在反对一面倒的国策，破坏中苏团結，在另一方面就是說只有資本主义国家好，苏联什么都不行，这說明我不仅是完全站在資产阶級立場，而且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場，是在崇拜压迫了我們一百多年之久的帝国主义者，把旧知識分子最起碼的一点民族立場也丧失了。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我也同样进行了誣蔑，我欣賞英国式的民主，說没有自由的民主就是不民主，誣蔑我們的选举制度，只在被选人上圈个圈；楊学通說宜兴埠农民苦，我就对黄公度說中国农民苦，說物資供应緊張是計划不好，是統購統銷搞糟了；听千家駒一次講演，說要以資本主义刺激社会主义，我就十分欣賞，認为自由市場应該恢复，不过我所說的自由市場是資本主义的自由市場，不是現在形式的自由市場。認为对外援助应該減少，最好关門建設，这說明自外交政策、經济制度、直到教学改革我都是反对的，我是在反对国际主义精神，反对計划經济，（我和黄公度引用英国海依克一句話："計划会造成由丰富到貧乏"，別的倒没有說过）反对我們的民主制度，其次，我对于历次运动，由于多少触及到我一点，就引起了我的仇視和不滿，覺得思想改造伤了我的自尊心，肃反对我的爱人斗錯了。总之，我是抱着抗拒态度来对待历次运动的。

除了这些一般的反动言行外，我还利用了人民大学的关系，有意地誣蔑南大党的領导，由于我在人大工作了几年，我就把那边同志們对我的一点客气和礼貌故意誇大，說人大是如何如何尊重我，如何如何信任我，意思就是要襯托出南大是如何如何不好，其实我对人大并不是眞正滿意，更不是說它执行党的政策好，馬列主义經济学搞的好，而是由于我

对南大一貫不滿，就利用这种表面的客气关系，藉以烘托南大不好，我越說人大好，意思就是越說南大不好。

我这些一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言行，是有历史和思想根源的。

我的历史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因为我很早就爬到統治阶級中去，我是在一九二七年就加入了国民党，作过伪河北省党部秘書，从一九二九年以后，虽一直教書，但也混到了相当高的地位，如在小組会中所交代的，解放前夕，我兼任过最反动的民国日报总主笔，用我的笔和党的革命事业作过战，我又兼了銀行职务，收入丰裕，我就是这样騎在人民头上过着高度的剝削生活，我受的教育又是彻头彻尾的資产阶級教育，特别影响我的思想的是我交代的那些資产阶級学者，我有这样的反动历史，又装了滿腦子的反动思想，解放后尽管人民寬恕了我，党团結我，重視我，給的我自我改造的机会，但是我不但没有誠意接受改造，反而抗拒改造，滋长仇恨，所以尽管我还处处掩盖，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早已在到处流露了，联系起来就很多，只是不象在这兩次座談会中表現的那样集中罢了。

过去在几次交代中，总是想辯解开脫，怕說出来后果严重，这种顧虑——实际上是抗拒，这样就阻止了我从运动中接受教育，及早回头，結果就更向毁灭的道路上馳进，各位代表的揭发和批判使我受到最深刻的教育，也給我指出了自救的途徑。我开始認識了我的丑惡，認識到我产生的破坏作用，認識到我一切罪行的严重性，当然这点認識还是极其初步极其浮淺的。但是我已經知道我一直是在沿着一条毁灭的道路前进，我一直是在开倒車，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不但已成为全国六亿人民的共同願望，而且已成为全世界广大人民的願望时，我竟站在一个相反的立場上要扭轉历史車輪与人民为敌，妄想搞資产阶級經济学复辟，妄想篡夺党的領导权，妄想以資产阶級經济学来否定馬列主义經济学，瓦解了馬列主义經济学，就是瓦解了社会主义的理論基础，这是攻心战术，这与右派分子雷海宗的馬列主义停滯論是異曲同工的，并且我也有类似的說法，說馬列主义經济学不能指导实际，因为现代的資本主义的实际

情况与馬列时代不同了，这可以看出我的思想是如何反动，然而这并不只是一个思想問題，联系到整个一切，就是一个严重的立場問題了，如果再不赶快悔悟，那就只有毁灭了。

我現在不仅痛恨自己，我尤其痛恨我侮辱了人民代表的光荣称号，我辜負了人民交給我的光荣任务，我对不起人民，我也辜負了南大党对我的爱护和尊重，我对不起党，今天人民和党仍在期待我，要把我从毁灭的道路上搶救回来，我不能再辜負了，我保証要繼續深入去挖掘檢查，繼續向我的組織上交代，作为低头認罪的一个具体表現。

傅築夫的發言

由于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座談会，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簡單說一下我对南大党群关系的意見，总的說，我对南大党的領导没有意見，个别来說，我对付校长没有意見，我觉得他是辛辛苦苦要把学校办好的，对前党委書記王金鼎同志，我十分欽佩，我和他有过不断的接触，也向他提过有关改进学校工作若干意見，对系委谷書堂同志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学生，就連接触不多的王震宇同志，偶尔碰面，他給人以亲切之感，所以就我个人来說，作为一个群众，我与党委領导之間没有墙也没有溝，其次关于体制問題，我不贊成取消党委制，党不应該对大学教育放弃社会主义的領导，我更不贊成恢复过去清华式的教授治校制，因为实际上那是把头治校，同样我也不贊成在整风运动之后造成另一偏差，即唯老是尊，把学校变成养老院，問題是应当对老年、中年和青年教师的意見都要信任，都要尊重，因为時間关系，对于这些意見所持的理由不作申述。

現在簡單談一下我对經济系主要矛盾的看法，由于了解的情况不多，提出的意見可能是很片面，甚至錯誤的，但党在号召我們帮助党整风，整风本是党內的事，所以要号召我們帮助，一方面說明党是大公无私，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群众的意見即使是錯誤的，也会起"有則改之，无則加勉"的作用，怕錯誤而不提意見，实际上是对党不信任的表現，是对不起党的事业的，因此，即使完全是个

人看法，也应当談出，供党作改进工作时的参考。

南开經济系和經济研究所在国际和国内都有一定的学术地位，直到現在还不断有国际友人垂詢研究所的情形，但是这个本已有一定水平的研究所和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地位的經济系，一个是完全死亡，一个是不死不活，这种情况，不仅校內人为之痛心，許多兄弟学校和經济学界的人也为之惋惜。今天是党要根治这种病狀，要挽救这个損失，我們就不能不找出矛盾的根源所在，不然就无法对症下葯，結果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使病更加沉重。

經济系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来，好象都是季陶达先生負責，因为他是系主任，但他自称是棋子，听說最近他已否認，不过事实上他的作用似乎不超过棋子，系主任是棋子，那么，他的背后必然有下棋的人，下棋的人是誰？最初有些迹象，好象要把一切責任都推到作过系秘書的谷書堂同志身上，但是有好些步棋，不但布局大，手法巧，而且对于党的威信和事业都有很大的損害的，谷書堂同志不能也不敢下这样的棋，同样也不是其他系党委同志所能下的。

最近校內和校外有不少同志在分析經济系的主要矛盾时指出付教务长滕維藻同志，是这些矛盾的根源所在，特别是在北京参加的一次座談会上，有很多同志以具体事实来說明他的种种作风对党的威信造成了严重損害，其中有很多事情我都是第一次听到，我在南大的时間不为不久，平时也深知經济系有些問题，但却从不去作进一步地追究，而却采取了不正确的高高挂起，采取了躲避的态度，只要事不干己，便躲进書齋不問外事，甚至躲到北京，求“眼不見，心不煩”，故对滕維藻同志的一切所知很少；其次，又因为我一向和滕維藻同志沒有惡感——这不是指見面时客气，而是我認为他很聪明，业务好，在最初筹备恢复研究所时，我还向負責同志推荐他作研究所所长，虽然那时我已听到了一些有关他的作风問題，但是为了工作，我認为他受过严格的科学訓練，懂得如何作科学研究，他是比較合适的人，但是現在党要整风，那就不能不本着“愛朋友也愛眞理”，本着党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聞者足戒”的号召，簡單提出下述三点，供党和滕維藻同志本人

作檢查时的参考，并且由于所举的事实有不少都是最近才听到，可能是不詳不尽，其中有涉及到在座諸位，希望及时补充或糾正，更需要声明的是，以下所說虽有些是得之傳聞，但說这些話的人都表示完全負責，都望党去調査。

（一）制造集团：党群間有宗派主义象大家所談的“溝”和“墙”等等，当然是不好的，然而却是自然的，是由許多原因所造成隔膜自然形成的，相信經过整风，也能自然地克服，因为那不是任何人故意造成的，但是滕維藻的集团則是有計划造成的，他們有核心，有外圍，有追随者，形成一个規模不小的小集团（实际上是大集团）过去我也听到，但內容不詳，最近在北京一个座談会上听到好几个同志談論“滕氏四杰”的情形，又有所謂“滕維藻路綫”并且这是“四杰”之一亲自对一个人講的（希望党去調査）据說他們有划定的一条綫，綫以上的人要打，綫以下的人要拉，不受拉的仍然打（如徐璇），凡是能爬上这条綫的，可以加薪，可以晋級，也可以連升三級，一个接近他的講师，不到兩年便由講师而付教授，而教授，連其本人都感到不安，这究竟是根据什么标准？据說在思想改造时，滕維藻同志把一个历史上有重大污点，解放后又“五毒”俱全的人当作典型，当众宣称，要大家向他学习，我自己沒有参加那一阶段的思想改造，不知是否确有其事，希望党調査一下，那个当作大家学习榜样的典型，究竟是个什么人？向他学习什么？

（二）大規模排斥異己：滕維藻同志过去是財經教授中唯一的一个党員，又是付教务长，主管財經各系，有关經济系的一切重大决定，他不能推卸責任，事实上許多大棋，我怀疑只有他才能下，而所下的那些棋，又都是以各种方法，在对一些人进行排斥，例如財經研究室的成立就是一个很突出的典型，把十几位教师从經济系排除出来，究竟动机何在？以研究为名另立机構，难道經济系不作研究？不能研究？既另立研究机構，何以又不聞不問，从来不作研究？叫財經研究室的先生們去搬書，抄卡片，剪报紙，也未尝不可，不过学校請来教授，就叫他們发揮这样一点作用？而且有几位本来是在教課，却是被停止了授課之后而驅入財經研究室的，这争夺之間究竟是个什么力量在播弄？夺取黃公度

先生的課是另一典型。黃先生教課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听說有一次滕維藻对黃說你教課是誉滿京津，这个突然的夸奬使黃为之惴惴不安，果然不久即由季陶达主任当面質問黃教書好的原因是什么？以后便經过多种布置和安排，停止了黃的授課。过去我一直以为是这是絕无仅有的一件怪事，教学好要受懲罰，但最近又听到类似的事还有很多，而且取而代之的都与滕維藻同志有关，这样就很难把这些事都解釋成偶然了。

（三）利用运动，进行打击：三反、思想改造等运动都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党是要經过批評达到团結，是对群众的一种教育，絕沒有意思要給任何人以打击，党更时时刻刻在严防偏差。在运动中群众不掌握材料，大胆怀疑是可以的，也是应該的，而領导运动和了解情况的人都不可以欺騙群众，更不可以利用运动作为排斥異己的工具。滕維藻同志为了打垮經济研究所（有人說最初他要向研究所安置他自己的人，此点希望党彻查）便利用三反对鮑覚民、楊学通兩同志进行打击，說他們联合或知情盜卖十几万冊图書，其实全部所有不过六七万冊，滕本人是研究所毕业学生，長期与那些書发生关系，知之甚詳，起碼自己讀过，用过的書知之更詳，丢掉沒有，一查而知，然而他不这样做，并且还欺騙一位先生說，他已經掌握了眞凭实据，叫那位先生去劝鮑先生招認，进行这样欺騙的目的是什么？管理图書的郑鍾塈自杀了，爱人也瘋了，郑鍾塈到底有沒有罪。他的自杀是畏罪？还是畏别的什么？这一件事，在北京的一次座談会上有好多同志提出，希望党調查。

根据我所听到的一切情况，我覚得这些事实对于党的威信和事业都有严重的損害，特别是身为党員，而与一些非党人制造宗派，形成大規模的集团，使“四杰”之名傳遍京津，实为党紀所不許，希望党尤其是滕維藻同志本人要深入檢查。

总之，我認为經济系的主要矛盾，絕不是党群关系的不正常，而完全是由于一个人的作风問題所造成，正由于这仅是个人作风問題，却又并不难把造成的損害加以糾正挽救。

經濟系副教授　陳國慶

（一）反對脫離群衆的“自上而下主義”

有人說，全国各个角落都已經透露春的气息，唯独南开园严冬警报尚未解除。我說，春天是擋不住的，“放”是客观必然性，管他警报解除不解除呢，只要相信党，爱护我們大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应該主动而又大胆地来“放”。我的顧虑本来也不少，想到这里，才毅然应“人民南开”之邀，准备大“放”一通。这里先談談我們学校內部矛盾的一个方面——“自上而下主义”。

誰都承認：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統一，是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絕对不可分割，可是，具体到我們学校生活中，各方面的領导常常生硬地把这有机統一的兩个方面强予割裂，片面地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来領导工作，特别是人事安排。这种方法相沿成风，积重难反，日久形成“自上而下主义”。

随手举些例子，就先說选举吧。选举是民主生活的第一件大事。大学里的許多同志既然被称为“高級知識分子”，又經过这些年的思想改造，論理无論从文化水平、判別能力等角度来看，恐怕总还比較能够独立地行使这种民主权利。然而，事实上，我們的領导却不是这样估計，却沒有給予我們这种最低限度的信任，以至我們学校中的各种选举，長时期以来一成不变地一直是由少数人包办，只有自上而下的集中，极少或者实質上极少自下而上的民主，充分表現了“自上而下主义”的严重性。

比方說，第一次区人民代表选举，当时群众对联合提名的候选人是經过領导再三說服才勉强打通思想，事后意見仍然很多。可是第二次呢，領导上并沒有吸取过去的經驗教訓，葫芦依样，甚至在做法上比第一次更不能令人滿意。对这次选举，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說，对这次候选人名單我事先并不知道呀；选民說，候选人由你們挑定的，領选票要在我名字画鈎子，投票要在众目之下排队魚貫而行，我就是不同意还能

怎么样呢？又比方說，工会选委員，候选人名單是由上屆委員会酝釀出来的（甚至范圍較小的部門委員会的选举基本上也不例外），各小組的代表只有临时就名單投票的份儿。有的代表說这种做法小組同志和代表本人都无法充分表示意見，实在不合理。可是領导上說票都是各个小組的代表投的，选举自然合法。难道說，在我們社会主义国家里，选举只要形式上合法就算了嗎？再比方說，选举先进工作者，第一次根本沒有什么选举手續，群众已經輿論大譁，不用去說它了。第二次呢，事先沒有宣傳、沒有酝釀，更說不上評比，只是因为上級有这样任务，定这些名額，就由領导上匆匆拟出几个候选人名單，請群众挑一下，群众說既然是任务，要挑就挑吧，挑那一个都行（自然，也应該指出，群众对这些候选人本身并沒有什么成見）。此外，出席校內外各种会議的代表也是这样，一律由上級包办。这种作风并且蔓延到民主党派以及其他社团。

为什么这样做呢？据說为了全面，为了集中，为的代表性。实际呢？为了容易貫彻"領导意图"，为了領导不必更多地开动腦筋。不必費力地进行細緻工作，就可以完成"領导任务"，到是真的。至于对群众、对工作来說，更多的不說，至少下述兩方面付作用是确实存在着的。其一，群众認为这些选举早已"內定"自已只有尽尽投票的义务，即使沒有不滿，至少也不会关心、不会重視。其二，选举出的人不少是凭領导主观想象，沒有在群众中生根；有些也許是有"代表性"，但是有些"代表性"未免太强，也太集中，以至不但代表不了群众，甚至也代表不了自己。

再說人事安排吧，領导不考虑群众意見的情况也很严重。远的不說，举几个最近的例子看。比方說，上次工資改革，在上面压了好几个月，到下面和群众見面，讓群众表示意見，原先决定只給一天的时間，后来有人反对了，才改为头尾不足三天。据說这样急是为了赶快补发，同时，工資調整的方案迟迟不与群众見面，还可以說是保密；可是工資制度不早一些讓群众知道，讓群众討論，以至后来很多人对这新制度还有不少意見，恐怕学校以外的机关很少是这样做的。这就使人怀疑：群众在我們領导心目中究竟估多少地位？我們敬爱的領导同志是否还或多或少地、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早被人民群众抛弃的"愚民政策"奉为領导良方呢？要知道，許多同志認为，这次由少数人翻来复去、費尽心机安排出来的工資方案，究竟有多大程度能够促进大多数人的团結，刺激他們工作积极性，值得怀疑；相反地，很多人更怀疑：这里面是否难免存在着不少的"首长主义"（听說第一次提出的方案中凡是系主任一級的一律二級）、"照顧观点"、"亲信主义"、"重点主义"（不少經济系教师認为自已是沒有被重視，也沒有領导替自已"爭"，听說在会上只有別的系对經济系提意見，經济系从沒有給別的系提意見。）

又比方說，学校里几乎全知道，經济系的季老，身体不好，教学、科学研究、行政、社会活动各方面任务都很重，簡直应付不过来。可是，等到什么新工作来了，領导上对这些客观情况全不照顧，只想到这个工作非季老莫办。譬如最近我們学校恢复經济研究所，又請他当所长；同时，既沒有減輕他所担任其他方面工作，并且配备的付所长（胡运昌同志）又是市里的大忙人，恐怕不是掛名也差不了多少。

再比方說，目前經济研究所开始有活动的要算資改研究室。論理一个科学研究集体放手由一个專家領导就行了。我想这种做法就是苏联也是一样。可是我們呢？这个研究室竟一下設了三个主任。結果呢？据我在极短时間工作中的初步观察，就发現：正主任又是忙人胡运昌同志兼任，自然明显地无暇兼顧；付主任学校一个、工商局一个，又各不能做主。学校方面同志有意見要由学校方面的付主任轉請工商局方面的付主任轉向忙得无暇兼顧的正主任請示办理。目前这兩方面已經产生的对工作看法的不一致，显然已經无法統一。这样的領导情况，要求作好工作，我想恐怕很不容易吧。

例子举的很多了，应該归納一下。我認为：这种"自上而下主义"的一个必然結果便是脫离群众、推不动工作的"少数政治"。这些由領导自上而下地选出或任命的少数人，在領导看去，他們好象万能博士，又象千手千眼佛化身，东也是他、西也是他，里也是他、外也是他，身兼多职，文武崑乱不擋。可是，实际上，群众有意見不用說了；对这些

少数同志，即使他們的能力一般較强，也未免顧了这头、忘了那头，那一方面工作也不容易搞好，上面下面压力对他們都很大，于是只好事事依靠上級佈置，时时向上級要办法，只有分头突击赶任务的分儿，沒有主动动腦筋想办法的条件。同时，对这些同志，更使他們苦惱的，六分之五的时間沒有保証，眼看着科学研究計划一期期完不成，对組織交待不下去，对群众起不了带头作用，对自己更不知从何說起了。

另一方面，我以为，这种“自上而下主义”的最后根源是党領导方面的宗派主义，因为，在我們目前条件下，分析到最后，学校工作的領导最后还是由学校的党委决定，或再归結为党的領导。我以为：目前，学校里党的各級領导同志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把眼光只放在很小的圈子里，放在少数党員以及所謂“骨干分子”与“进步分子身上。他們只相信这些少数人，有事只想到他們，只願意向他們征求有“代表性”的意見，圈定他們作多种选举的候选人，派他們出席校內外各种会議，委他們担任各种工作的領导人，相信只有他們才能执行和貫徹党的方針政策。可是，这些人，虽然他們除了党內同志外，多半是在过去各种运动中表現得比較好、比較“进步”、比較积极，同时又比較靠攏党（从一方面說，这些应該說基本上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人毕竟是少数，并且更成問題的，这些人从旧社会过来，大多数群众观点原来就不怎么强，在“少数政治”的压力下又更难免脫离群众，結果原来是群众自己的党竟和群众被不通风的墻所隔开了。

其实，据我初步观察，最近大家所提到的党和群众之間的墻还不止一道。例如举經济系的情况說，我最近就有“五层論”的看法。就是說，以系的党支部为核心（最里面一层），外面一层是少数和某些党員往来密切、积极爭取入党的同志，还包括一部分行政領导；第三层是少数过去在各种运动中表現积极、現在大半担任某些（还并非全部）民主党派工作的同志，也包括一部分行政領导；第四层是一般教师同志，第五层是长期被目为“落后”的同志。应該說，这些层的形成，虽然也有其一定的历史的原因，虽然并不是某些人自覺的主張，但是，主要的，它毕竟是出自人們的主观的、同时又是僵化的、違反唯物辯証观点的看

法。而其結果則是：党的領导就給自己設下层层閉塞耳目聰明的障碍，使党不能透过这許多层的墻来看清群众的面貌，听清群众的呼声，而把党的領导局限在范圍很小的圈子里，局限在身旁少数难免还是脫离群众的人的呼吸中。这样，党就和群众疏远了，上下不通气了。

今天，我們要反对“自上而下主义”，要拆掉这些危害我們大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墻。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成員，特別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干部，我要带头帮助党来拆掉这些墻。

校領导对經济系的教师估計过低，从而就沒有积极的組織他們发揮这批人的作用，甚而把部分人看成了包袱。某教授在写批判胡适的論文时，領导上就叫系助理（党員）去帮助。我想既然要这位先生去批判胡适，就应該讓他自己去写，写出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批評。为什么要找一个人去“帮助”呢，况且这位年青的同志是否看过胡适的著作也是大可怀疑的。讓这样的人来帮忙，必然是越帮越忙。这說明了党和領导把我們估計的太低了，把一个学有專长的老教授看的連一个年輕人都不如。这个問題实質上不只是对老教师的不信任，同时，也說明对科学研究缺乏正确的了解。

今年在校务会議上討論教务处拟定的学年論文和毕业論文的办法中，别的系都有，唯独把經济系給拉了，这也不能被看成是偶然的事。由于，各方面的不重視，因此許多教师說，經济系在全校八个系中是否是第八位也还是可以怀疑的（意思是連个地位也沒有）。

另外財經研究室的成立，分明是在說这部人不需要，但也沒处安插，放在一边再說。大家为什么有这个感触呢？財經研究室开第一次会，領导这个研究室的我系副主任陶繼侃同志就迟到了几十分鐘，这就反映了領导上对財經研究室的重視程度。当然，其后財經研究室什么工作也沒有开展起来更証明了大家的推測不是沒有根据的。你想在今天讓一个知識分子长期沒有工作做，这在他該是一件多么苦痛的事。无怪財經研究室有位同志在調离前感叹地說，不要認为每月給我們照发工資就行了，而要考虑到我們是“人”啊！这是多么痛心的話！

我們經济系的教师是不是眞的不行呢？不是的，許多从我們学校調

到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东北財經学院的教师，都一个个成了那里的骨干，他們工作得都很好。为了发揮經济系教师的作用，因此，我希望党和学校領导应該对我們重新作一下估計。

在談了有关經济系的情况后，何启拔副教授还批評某些党員和領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一些問題，他說，在我校領导干部脫离群众，他們只听取一小部分"积极分子"的彙报，而不深入了解大部人的情况。有些同志在入党前，和教师們还是有来有往有說有笑的，但一入了党就和我們疏远了，他們冷冰冰的，把"党性"表現在臉部表情上和我們交往也似乎生怕沾染了什么似的。我想党吸收他們是希望他們能深入联系群众在群众中起作用，而不是讓他們脫离群众的。此外，有些党員同志表現得不虛心，如谷書堂同志給傅筑夫教授一篇論文提了一些意見，但在发表时却毫不謙虛地把自已的名字也掛上了。我看这个做法不一定恰当，这同时还是一个如何对待别人的劳动成果的問題。总之，我希望党和学校領导今后能多多听取、征求和重視，我們教师的意見，来不断改进我們学校的工作。我要求党和学校領导能更多的重視我們的意見，多和我們商量，并不是說要求取消党委制、要求教授治校，而是要求加强党委制，希望党能較多走群众路綫，能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見后再对重大問題作出决定，从而更好的組織群众发揮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来推动我們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原載"人民南开"164期）

（二）陳國慶的六條意見書

編者按：这是陈国庆假借民盟支部名义歪曲事实提出的反党綱領。該意見書在他送交曾鼎和同志要他轉交党委时，遭到了曾鼎和同志的拒絕。

中共南大党委会：

为了帮助党整风，民盟南大支部于六月一日下午举行了一次扩大的組織生活，分五組座談。在会上盟員和盟所联系的群众对党組織及个别党員提出不少意見。鑒于群众比較普遍地認为目前整风运动已进入第二

个阶段，群众肯不肯和敢不敢进一步提意見，要看党組織是否能够真正貫徹边整边改精神，能够在最短时間內解决若干群众認为可以解决而且应該立刻解决的問題，以具体事实教育群众，增加群众对党的信任。特先將这次会中群众所提出的一部分具体建議，整理反映如下：

（一）平反問題（包括三反、思想改造及肅反中的問題）应該迅即研究不同情况用不同形式向群众交代清楚，承認錯誤及缺点，恢复受屈者的名誉（包括已自杀的人）。

（二）人事安排問題，党团員，特别是領导干部的爱人，在人事安排上有特权。无論职位、工資等級均和其才能不相称。这不符合党員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品質，而这些問題是非明白，在校內容易处理解决，希望能迅速糾正。

（三）工資等級問題，不少人認为上次評薪定級不公平、不合理重德輕才，党团員和积极分子偏高。有人認为工資由少数根本不懂学术的人事干部盲目包办，范恩涛同志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有人認为这次調整不应做为某些党員自觉地要求減薪降級，而要視作过去評定不当，徹底研究檢查糾正，由行政明令执行。

（四）經济系和經济研究所問題。經济系人多，有基础、有条件，而潛力发揮不出来，是严重浪費。經济研究所也形同癱瘓。应促請領导重視，彻底研究解决、应該广泛发动群众充分討論，尊重老教师意見。过去对經济系和財經研究室的人事安排，是根据誰的意見？誰是最后决策的人？应該找出来，明辨是非，追清原因，吸取經驗教訓深入檢查，糾正錯誤，以保証今后工作的改进。

（五）遵守学校制度和紀律問題，很多党員，特别是高級干部，不遵守規章，破坏学校制度。例如生活补助費的特殊照顧，多借工資，私事坐公家汽車，乱請大夫出診。不問工作条件和需要，安插爱人等等不良作风，請党組織公开表示态度，对党員加强教育，并制止以后再犯。

（六）学校制度問題，很多人認为人事处权太大、太神秘，人事制度不健全，严重地造成党群之間的隔膜。学校学术空气不濃厚，官风压倒学风，不应該讓行政領导来領导学术，而应該讓学术上有成就的老教

师領导学术委員会，这些問題希望向上級反映，并研究討論，以謀改善解决。

以上各項意見希望党組織及时研究考虑。并亦接受下列兩点建議：

1. 对各項意見和建議及时成立若干專題研究小組，并吸收民主党派、工会和非党人士參加，共同研究处理办法；

2. 对各項問題的研究結果及解決措施，应于較短时間內通知民盟組織，以便向盟員及群众說明交待，协助党做好宣傳教育工作。

（原載学习簡报第26期）

經濟系教授　林和成

“听总理报告后感到无限兴奋，同时也感到非常慚愧。自已过去曾留学英、美、法、德各国，也到苏联去过，花了不少人民血汗，目的为了国計民生，抗战期間曾作国民党监察委員，由于旧政治的污濁也未能对人民作出貢献，二十几年来主要是教書，翻譯各种外国書籍，大部头的書写了十几本。写書并非本願，无非找个精神寄托，解放后人民銀行南汉宸到上海找我到总行作專門委員，地位待遇都很高，曾带領二百多人到天津調查大工厂大商店，作了不少工作，以后因身体不好，到学校教書过着偷懶苟安的生活。总的感觉是：中央的党，高級的党对知識分子精誠团結的、大胆放手的。

南开大學的情况是大家互不認識，校长高高在上，党委書記更見不着面。本来校长就是教授教授就是校长，而今天这种情况只有資本主义国家才会发生。例如在紐約，住在几十层楼內，大家是不易見面認識的，哥倫比亞大学校长等負責人就都是高高在上的。可以說南大的团結太差了。为什么大家互不認識呢？因为大家有顧虑，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不認我，我不認你。留美的学生罪該万死？会說英文的就是崇美，帽子扣的很多，究竟扣的合不合适就不管了。大家都担心不知那天算总帳，只好少認識人为妙了。譬如介紹外国書，在这种情况下，誰还敢介紹英文書籍呢！大家只好客客气气刻刻板板，八股最好，沒有毛病，脫离了

各种公式，就說你思想有問題，給你扣上亲美、反苏、反共的帽子！孔夫子以后，不說孔夫子的話就不行！口口声声叫学生独立思考，但是眞正教書时，是教給学生苏联如何如何，再套上公式、教条主义！同事之間的关系不自然，都是唯唯諾諾，尾巴主义，这种情况經济系特别厉害，帽子最容易扣，我們不知自然科学中有沒有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思想問題，我們經济学中一切都是学习苏联，好象我們中国一点文化都沒有了，我們中国在文化上有很多創造发明，好象也得待考，一切都是苏联好，这个是苏联学者发明的，那个也是苏联第一，其他国家都不行，对这种情况我們年老的教授觉得蹩扭，整个說来，我們中国今天的科学是落后的。但就个人来說，很多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例如在美国的优秀的鋼鉄工程师、造紙工程师、飞机制造工程师不少是中国人。我們有很多知識分子是到过各个国家的。有很广的見聞，知道的事情也多，如果你不从实际出发，乱批評一通，他們就会感到蹩扭。

今天沒有一个知識分子那么傻，还不知道社会主义，还不知道中国以及整个世界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除非他是个瞎子或不講道理的人。我們知識分子，虽然自已慚愧，現在还不够作党員的資格，但努力目标是肯定了。而今天有些人一作了党員就成了“高等华人”，他們說話就都是对的。开起会来只有他們几个人講話，他們認为别人都落后，都是什么資产阶級出身，都得服服貼貼。这不是說中央的党不好，而是这些党員太幼稚。我認为无原則的接受任何思想，沒有批判，沒有比較地接受任何事物，并不見得就是眞进步，而經过愼重的选擇再作决定，就是落后一些，也比动則取巧的好。

民主党派的成員里也有問題。有些人看見党团員就必恭必敬，党团員那还了得！这說明太幼稚了。我們要尊敬眞理，不是党团員，只要符合眞理，我們也应該尊敬。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只是表面上和和平平，客客气气，相安无事，但是心里并不服气。我們南大有宗派問題，有旧南开，有外来的，也有党团，民主党派系統的，某人有些关系就提的高。如果說某人学問好，就来个“他的單純业务观点很严重！”如果說某人有著作就来个“他的

資产阶級毒素很厉害！'"也没留过学，也没有教过多少書的，就說他道德如何好，实际上年青人既没參加过二万五千里長征，也没有吃过什么苦头。道德好在那里呢？至于談到某人是国际权威，他的書行銷国外也不在話下。这样的一种宗派就造成一方面是得意洋洋，另一方面是閉門思过，罪孽深重，結果一本書一篇文章也不出来了。这是个很大損失！这不只是南大如此，政治、經济方面当然不用談，就是統計会計自然科学方面为什么一本書也没有出来，也没有人講演了呢？如果有就是"自我批評"或是批評什么人的資产阶級思想，批評自我批評都是需要的。但是究竟有多少积极的东西拿出来呢？

有宗派，精神上就不舒服，就容易造成消极或是假积极，这对科学是很大損失！向科学进軍喊的是很响，但科学是不能突击完成的，不能当时髦，向科学进軍，达到国际水平，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現在的国际水平。自然科学我不曉得，統計方面，最新的，我看过48年的著作，48年的書是38年开始写的，总要写十年，現在快要到58年了，我知道的是20年前的先进水平，我們要赶，人家也并不睡觉。要想知道什么是現在的国际水平，我們没有外国杂誌，苏联有各国的杂誌一万多种，我們就知道批評，究竟錯在哪里呢？实际也不知道。

总之問題是很多的，知識分子还没有死，有生产力。够上国际水平的中国知識分子，国内国外都有，他們的天才都够，張国藩、楊石先的論文都不錯，就是差了20年。他們有决心，有能力，就是精神差了，問題在于眞正放手信任他們，如果实实在在地对他們誠恳地尊重，知識分子有个"士为知己者死"的傳統，他們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所謂"一簞食，一瓢飲，乐在其中"就是知識分子，士大夫的傳統。长点薪水，吃飯不叫他們排队，出門坐个汽車等等物質上的东西，他們是看不起的，知識分子是不能利用小利小惠来收买的。今天为什么很多在国外的大科学家願意回到祖国来？他們在外国的物質条件都很好，就是因为他們爱国，他們是知識分子！今天对待知識分子的尊重，还没从联系上，团結上表現出来，还未調整以往对他們的歧視，精神上未解放，未恢复，要解放他們精神上的負担，要眞实的解放，眞誠的团結，是眞的还是假

的，知識分子是看的出来的。

怎样发揮知識分子的生产力呢？要改善生产力的关系。有了机器、工人不願意作工，或是三心二意地作工也不行。改善这种关系要从改善精神上的愉快入手，作到了这一层，才有希望向科学进軍。如果只是写几篇自我批評的文章或是批評批評資本主义国家，那不是积极的，对向科学进軍没有帮助。我們不能硬搬苏联的东西，苏联是苏联，与我們不相干，或至少目前不相干，苏联在前进我們硬套苏联的公式不行。自然科学的公式是可以反証的，３＋２＝５，５也等于３＋２，社会科学翻过来反証就不行。教書就要結合实际，我們今天是教条主义，脫离实际向科学进軍就是既不知道国内实际，也不知道国际实际，我們没有外国書籍外国杂誌，俄文是可以突击的，德文英文就不行，图書館，和我們不相干，有的只是俄文翻譯書，又叫人看不懂。向科学进軍不能單枪匹馬，現在向科学进軍，既不能參观、考察，也没有图書仪器，大家只有互相抄，变成了"文抄公"抄完为止，抄完了加上帽子，公式就是如此。

当然他們是不承認有宗派的，但是必須打破这种宗派，才有精神上的解放和安慰，我并不是說我們思想不自由，我認为要把思想領域，思想范疇扩大一些。

向科学进軍，就要給研究时間，过去通知你开会，你不去參加，就給你扣上一个單純业务观点的帽子。

要把党的大門大大的开起来，使知識分子感到他們并不是要不得的人，这才是眞正的困难，开誠布公的团結，毫不顧虑的团結。

过去往往是屈打成招，不管眞正有无事实，就用政策威嚇你，說什么"如果坦白，就寬大对待，否則只有死路一条，"高喊"死路一条"……。結果打了一頓，以后証明并无其事，又說"这是你的成績，能够經得起考驗"，眞是"妙論"！

（1956年５月28日在南开大学部分盟外教授座談上的发言）

× × ×

"国家統計局与南开大学的联系不够：（１）統計局与老年一代的

統計学者脫了节，是否否定了老年一代的統計学者。他們几年来沉默寡言，多半是因为不敢說話。統計局关于統計工作的方針、方案的制定，没有邀請老年專家参加，我想这里并无保密問題，应該邀請他們参加。（２）統計局的一切都学苏联，这是对的。不过科学不应該有国界。只要这个办法好、科学，就可以不管它是哪国的。（３）統計局对我們有帮助，但不够。連报表制度也因为是密件不能充分供給我們。

在学校方面，我們的任务培养建設社会主义的統計人才，要向科学进軍，在 12 年內赶上国际水平。根据这兩点，希望統計局多多帮助学校。学校的統計教材非常簡單， 充滿着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 世界上有 140 多国，不能只看苏联一国。重重复复的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不符合中国情况。

任何发展了的科学都是以数理为基础的，但我校未开数理統計課程，因为学生的数学基础差，不懂外国文，甚至有的連国文程度也发生問題。他們看的是人民大学出版的几本書。我校的教材九成是人大的，人大的教材九成又是莫斯科的。用这种教材向科学进軍，差得太远了。眞所謂坐井窺天，不知天有多高。

統計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需要作很多改良。統計工作、統計教学和統計科学研究三方面的合作，才是这种改良的唯一办法。解放后，南大經济研究所停办，材料分散，有一部分人調到人大，生活指数被認为没有必要編制了。現在南大經济研究所虽已恢复，但能否恢复到过去水平，还是个問題。高教部盲目調整，忽視学校傳統，这說明他們做事无远見，操之过急。

最近我校經济系与紡織部紡織科学院及天津紡管局合作研究紡織品品質控制問題。試驗合同是一年，每月开会一次。这种做法是很好的，統計局应多多提倡这种合作。有了合同关系，便不会分彼此。

提高教学質量应該采用現代最新穎的統計方法。应該在国家現有老一代統計專家力量的基础上改进統計方法，应該改变現有一套的关于統計的說法，取消清規戒律；应該鼓勵統計界前輩說話，取消否定老年学者的态度。在学校內，年老的統計学者都没有教課，教課的都是青年同

志，現买現卖，总是差些。

否定其他国家統計方法的做法也应該改变。我并不是提倡英美統計学，但在理論統計方面，英国是了不起的；在应用統計方面，美国很有成就。

总之，要提高教学与研究工作質量，要尽量发揮旧統計学家的积极性，要栽培新的統計学家。

解放前有个統計学会， 知道某人在何处，便于相互請教。 解放以后，大家星散，情况不明，最好請統計局調查統計一下。統計局是否可考虑建立統計学会，每年开会一次。

在統計学术方面，希望多开座談会、討論会、講演会，希望多請我們参加。

統計科学研究必須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是人才；第二是資料；第三是仪器設备；第四是出版。

（１）目前培养人才有困难，大学生水平比較低。解放后的助教与解放前不同，現在的助教高高在上，認为老教授落后。眞正培养，不胜其繁，因为他們外文不懂，数理不通。但不好好培养人才，要进行統計工作也有困难。

（２）資料的取得很困难，空白报表常常改变。希望統計局的报表制度、內部刊物多多供应給学校。对目前的統計書籍、資料、論文，統計局应做一做調查工作，彙編成目录。

（３）目前設备仪器很缺乏，应設法解决。

（４）出版方面：現在可以說只有統計出版社一家。过去写書有把握，出書有把握；現在出書无把握，辛辛苦苦八、九年把書写好，拿到統計出版社，被退回。現在的出版业务应扩大，編輯水平也应提高，把一本書拿給陈达老先生的学生的学生去审查，是不行的。1956年后世界上統計書籍很多， 質量比以前提高不少， 很好把这些書影印或翻譯过来。旧版的統計書籍（如鄒依仁、金国宝、薛仲三的書）可以再版，馬上供应社会的需要。 老教授的書不敢拿出来。 新書出来不要一棍子打死，这样，他們的著作才能慢慢出来。

总之，数学与研究工作都要統計局多多帮忙，多供应資料，多邀請我們开会，把統計科学研究确实提高到国际水平。

（在国家統計局会議上的发言，轉自 1957 年 12 期"統計工作"）

× × ×

"民主自由"不能空談，具体表現为言論、出版……自由。解放后思想上有顧慮，有障碍。現在有思想、言論自由，希望这个眞正民主更扩大些。

（1）党团与群众的关系：剛解放在上海，南汉宸很客气接我到北京对党感想很好，有一次南汉宸講演說党員有"前途"，党員有"前途"很不舒适。南汉宸侄女搞人事罵人，态度使人受不了。有一位同事病去上海，有一人結婚檢查了好多次。

（2）馬列主义先要調查研究，在"三反"多少人受冤，死了多少人，逼死多少人，多少人成神經病，如对沈默涵的态度，这对知識分子办的过火，这是太粗暴。要彼此相互信任。

（3）尊师的問題：在思想改造时，学生审先生，先生还有臉教学生，死了有小孩、老婆如何办。

（4）本校是否尊敬老师：胡剛复先生有学問，如开物理学会自己去，系主任发脾气。如开些学会，科学討論会厦大請我去，并未通知我，年老教师无所求，有些事不讓我們知道，这如何团結。会計某教授去北京开会，借款条要系助理批，有些人不与系来往怕碰釘子。

（5）如科学研究，不是搞运动，如与紡織医院研究，系不关心。如要买書，买不来便删去，需要助手等……都不关心。

（經济系第三小組討論毛主席講話第一次会議上的发言 1957.5.11下午）

× × ×

"我发言代表年老及留学的学生，对近几年的看法。

这个警报很厉害，不是三几天，想我們这一般人，一句話不敢說，不知那一天出問題……过去很多書都燒了。外国朋友不来往，新的朋友不能交，这一种警报連无綫电不敢开。这是几个大运动而来，内心惧

怕。虽然新社会是好，就觉得不自然、不舒服、这些都是人造的。現在有了自由，感覚舒服些，自由是言論，职业、行动等自由。現在警报虽解除，恐惧仍有，有些无辜受冤如何交代，要看行动。

目前矛盾是党群关系，如在人民銀行，精神上不痛快，党員高高在上，党員有前途，非党員是图錢（途前）。瞧不起非党人士，如何在精神上使人发生愉快，有些人有功，应該人位相称，这是分贓制度，这种政治是开玩笑，这样做使老年者灰心。

有些党員品質很坏，如人行一处长乱搞男女关系，影响很坏。处分是輕的，行长的侄女儿二十岁做人事付处长。党員成为特殊阶級。一般人要清高，不願意被人支配。党員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級，这样使社会內部矛盾永久矛盾。

要消除这矛盾，要消灭統治与被統治阶級。要眞正的民主，眞正的自由。如在苏联及民主国家可看，听美国电影、美国之音。

如做系主任党員与非党員不一样的。要一律平等。

民主要扩大、自由、平等，否則后果堪憂。开言論之路，年老人不是很簡單的，目前只說三分，要眞正开言路，看事实，要消除过去的影响。

× × ×

（1）有意見不敢向系主任提，系主任耳聾，付系主任笑哈哈有問題要找系助理，自己不願，有意見不願談了，这有好些人。对系主任有隔膜。

（2）节約問題，教师人位的适当問題，把教师要他用非所长的在系、在图書館內都有，这要好好考虑，要人按其位。如某人可以教英文，在处边找，在图書館不放。学校是一个整体，系与系、系与图書館不該有本位主义。內部調整，可以各尽所长。有意見到人事处打官腔。"

（經济系第三組学习內部矛盾問題小組会議上的发言1957年5月18日下午）

× × ×

"几年来，經过几次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使知識分子处在恐怖狀态中，任何話都不敢說。因为現在的时代，可以說是是非不辨。今天說是好的，明天就可能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轉弯，說成坏的。比如斯大林，以前是样样好，誰敢反对！后来反起来，就坏了。

目前知識分子的顧虑打消了一些，但还有。因为这不是一句話的問題。你今天說了，过了三个月，就可能挨"整"。所以，要叫大家没顧虑，一定要拿事实来証明，保証眞正做到"言者无罪"。比如，在三反、五反、肅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有多少是被冤枉的人！有些投江、自杀死了的人的冤魂还在叫，有些人还在神經病院里发瘋，对这些人，如何交代、安慰，应有切实的举动，才能广开言路。

二十世紀以来，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自由与民主。在我們国家里，是有民主自由的，但不完全、不完整。比如过去我們总是划个圈子，把思想禁起来，一切发表的言論，尽在圈子里。因为思想不自由，人家不敢思想，結果只有不說話没有毛病。再如开会、布置工作，都是做好了方案，拿下来叫执行，在知識分子看，这也是个民主問題。

当然共产党的功績是无可否認的。中国在解放后短短几年里，国家能弄得这样好，实現了眞正的統一，在經济建設、人民生活、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提高，是史无前例的；我国的国际地位現在这样高，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这些不能不佩服毛主席、共产党的領导。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受尽列强欺侮，最大的希望是国家强盛，所以，我們知識分子崇拜毛主席，共产党是不容怀疑的，对社会主义也是没有怀疑的。但建設社会主义，是否完全按苏联的一套方法，却大有問題。这几年，人民生活中有些痛苦没有？財政分配上是否全无問題，建設計划有无問題？应該說，整个是好的，但也是有問題的。这些問題，应多請專家，不管党內党外，来共同研究解决。

几年来，党与非党存在着矛盾，現在一切統于党，非党与党脫离关系，对立起来。"牆"和"溝"是有的，这"牆"和"溝"是在变高变深呢。还是变低变淺這？我看还是在日益变高变深。所以，我認为一定要把党和非党关系搞好，不然，如果逐漸发展下去，我担心会发生事

故，象波蘭、匈牙利那样不幸的事故，是应当尽量避免的。

党与非党关系上，突出的是"三大主义"：一、宗派主义，实在要不得，有这个，国家的事情就办坏了。要好，在用人上一定要以才、德取人任事，不能以宗派因人設事。所謂"德"，当然不是指扛过几年槍杆子，而是新的道德。現在机关、学校，領导干部都是用党員，用抗战軍人或从朝鮮回来的，这是封建制度，不能以国事开玩笑。二、教条主义，講起来眞可笑，盲目地生搬硬套外国人的东西，比如組織疗法、无痛生养、睡眠治疗，乱来一气，都鬧出笑話，使人对新东西发出厌惡。做学問最恨教条，学問是不問那个国家、那个人的，只問是否眞理，是否事实。一定要說什么国家、什么主义好，"一边倒"，是不行的。中国受教条主义的病最厉害，在学校里，一切都从苏联搬、人民大学搬，不論对的錯的，一概不管。三、官僚主义，危害很重，一个年青的党員廿来岁，一切都敢作敢为，但他既沒有学問，又沒有經驗，所以只能靠发号施令，靠官僚主义作风来办事，这怎能不犯錯誤！

对"三大主义"，深一步研究看看，一般党員、特别是解放后入党的年青党員，他們的思想动机究竟何在？是否入党是为了个人的前途，得到"仕祿"的捷徑，特别是个人享受？或是存有出风头的思想？应該檢査檢査，究竟是何种思想在作祟？依們看，在我們学校里，这种思想是有的。有些人入党以后，待遇高，生活特别优厚，爱人找事特别容易……。我看这不是高尙的共产党員应有的品德。

最要紧的是信任人民，相信人民有能力来研究問題，人民所說的話是为国家好的。从信任人民出发，才可以找到自由与民主。比如政协中，讓教授站在那里，叫学生来批評、斗爭，在学生眼里，我們是落后分子，誰还敢接近呢！"

"所謂苏联專家就是'小白楼'的白俄"，"不懂别国文字，为什么对苏联專家捧得那么高呢？""苏联教师是北京卖面包的。"

"听外国的跳舞音乐很舒服，为什么放苏联音乐呢？"

"苏联对各国的援助不是眞誠的帮助，如援助波蘭，为什么波蘭还要去向美国求援呢？苏联的援助是不要你餓死，从各方面来控制"，

"援助中国仅之亿元（意即太少）不是眞誠无私的。" "苏联要人家撤退軍事基地，为什么苏联要在国外駐軍？ 原子战争时代， 无前后面之分，无必要駐兵东欧"。"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是苏联人，到波蘭去作国防部长，統治波蘭，这有伤波蘭的自尊心，如果一个外国人担任苏联的国防部长或到我国来当国防部长則如何？"

"（社会主义陣营）以苏联为首，苏联則是春秋战国时的霸王，其他国家則是附庸，在外交方面跟着苏联跑，苏联发表一篇声明，我們就跟着跑。"

"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由于苏联及社会主义陣营的出現，才造成国际紧張局势。"

科学不应該有国界，只要这个办法好、科学，就可以不管它是哪国的"，"学校的統計教材非常簡單，充滿着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世界上有一百四十多国，为什么單学习苏联？重重复复的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不符合中国情况"，"我校的教材九成是人大的，人大的教材九成又是莫斯科的，用这种教材向科学进軍， 差得太远了， 眞所謂坐井观天，不知天有多高"，"否定其他国家統計方法的作法也应該改变"，"在理論統計方面，英国是了不起的， 在应用統計方面， 美国很有成就。"

"中国民主党派是在野党，民主党派毫无实力，互相监督是句空話。

"在新社会彼此不能說話，不能交朋友，人与人的关系变了。"

"喊毛主席万岁"是不对的，这是封建时期的作法，我們好象在封建社会。"

"不能提意見，人事部門掌握生杀大权。"

"政治課教师都是党团員。"

"解放后不自由，話只能說三分，解放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我又不是三岁小孩，給我一塊糖吃，就把話全說出来？"

"思想改造运动是学生整先生，不講仁义道德，太不近人情，'三反五反'年輕人审人，不說死路一条，生命财产都掌握在年輕人手中，不知寃屈了多少人。"

中文系講師 朱一玄

寫給南開大學黨組織的信

我曾經以候补党員的資格在党內过过几年組織生活的。后来虽然由于我自己条件不够，未能轉正，但由于在党內所受的教育，使我認識到党是眞正为人民办事的党，因而縱然我被取消了候补党員的資格，仍然和党有着深厚的感情。

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感情， 当我看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的时候，我特别要給党提意見，希望党及时恢复并且进一步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是不是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了呢？以我个人的看法（也有别人提到）比解放初期，是降低了的。

天津剛解放的时候，我所接触到的共产党員，的确称得起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在各种工作中都看到共产党員在带头，有一次，全校清洁运动，我和一位党員同志在一組，他冒着冷风比誰工作得都起劲，以带动群众。现在的高教部付部长黄老，当时是天津市委文教部长，到学校里来和教师們座談，穿的是农民們常穿的那种棉鞋，吃自己带来的土烟，有人把烟拿出来招待他，他都不肯吃。辛毓庄同志不算低級干部了，生活艰苦到連买紙烟的錢都沒有。但我知道，全国人民也知道，就正是这些艰苦朴素的优秀党員（当然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党員）領导全国人民解放了全中国。誰看到这种情况，能不对共产党員肅然起敬呢？能不覚得共产党是人民自己的党，是自己的救星呢？

有这样的事情，使我們傳为美談；有一位共产党員銀行干部，（某同事的亲友）在他前一天晚上接到組織交給他的任务，把他調到另一个地方去，一切不管，第二天早晨就很愉快的走了。

所有干部，全身衣服都很髒，油垢很厚，但我从心里願意和他坐一起，認为他的艰苦朴素，眞是值得我佩服！也的确是在那些干部的带动

之下，全国出现了儉朴的良好风气！

亲爱的党，不多說了，总之，那时您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眞是高呵！

領导权的問題，在我的心目中沒有发生过。不讓这样的党来領导，讓誰来領导呢？

从那时起一直到現在，一直到党决定整风时止，領导全国人民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且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仍然很高，这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是在提意見，那些成績不在这里說了。

可是，为了爱护党，我必須着重的提出缺点，縱然可能說不对，我也不管了。正象党經常教导的那样，"有則改之，无則加勉"吧！

我感覚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具体地說，党在我的心目中及我联系的部分群众中（不多）的威信，比解放初期是降低了！

为什么会降低呢？是一些什么現象使群众对党不满了呢？

当然总的說来，是党中央所指出的"三大主义"的"三害"了。

但具体到南大来說呢？

中心問題，是一个問題。

以学校領导干部来說：从解放以来，党的总的作法是在一切部門尽可能的用党員代替非党員的領导干部。旧的人漸漸換下去，新的党員干部漸漸換上来。在有些部門由于党的干部还沒有那个能力，就派进个党員作付职或当秘書。虽为付职或秘書，实际上是权比非党干部的正职大的。

与此同时，跟着来的思想工作是党能不能領导教学和科学研究問題。得出的結論呢？是党懂得馬列主义，什么都能領导。

这些放到領导地位的党員干部，是不是在能力上，在資历上，在威望上都能使大家心服呢？是不是把工作都作的很好呢？往往是党員布置，群众跟着走。群来对党的干部不心服，就很难发揮积极性，也有人覚得自己話不被重視，有意見說了也白說，干脆不說吧！

无形中，群众覚得他和共产党不是"一家人"了。起碼不是知己朋友了！也就是說党逐漸在脫离群众了。

我校在配备各單位党員領导干部时，是可以称得起"不問資历，大力提拔的"的。也就是說从資历上，从年龄上，从專长上，从經驗上，有些干部在群众眼中，是覚得提拔的够快的。我曾举过罗振濤同志的例子，从工警級提到科长級，沒有特殊的模范事蹟，是很难令人心服的。反过去說，郭平凡在解放前是科长級，在三反肃反等运动中，并未听得說发生問題，在評优中又曾被評为优良工作者，現在却降到了科員級，这現象除了用宗派主义解釋外，又能怎样解釋呢？

好！在职位上大力提拔了，分配房子自然要提高到和他职位相称的标准了。到評定工資（調整工資）时，又有二条，职位提高了，工資也要跟着提升，这样，工資也要跟着提升了。

这些被提升的同志，又大多数在做行政工作，看不出有什么突出的特长，又未必是优良工作者，他們一級一級的提升了，讓那些比他們資历老、經驗多，反而在他們下边的人，怎么去想呢？很可能，他們的解釋，提升的原因，就是由于入了党。我看，把入党和提升职位联系起来，是不見得妥当的。

又听說有些党員干部的爱人进学校工作，特别容易，非党干部的爱人得到照顧就很难，如果这种說法有根据应該是和"特权"联系起来看。

有些党員不遵守学校的制度，到卫生室看病，不象群众那样守制度；有人騎公家自行車到街上办私人的事。特別刘付校长坐公家汽車到俱乐部跳舞，无論从行政角度，还是从党的角度，都是很不应該的。現在当領导不同旧社会，旧社会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点灯"。今天呢？領导就得是在各方面能为群众表率。作为共产党員，要求还更要严格些。

从南大党的領导机構說来，从前总支委員会时期。金鼎同志在这里，总支人数不多，联系群众还比較广些，現在成立了委員会，書記和部长都不是和广大教师有联系的，因而就更脫离群众了。

邢公畹同志担任了工会宣傳主委，他說，有一次党委会有一位姓曹的同志找他給他下命令，官气十足，因而使他对党委会的印象很不好，公开发言，撤回入党申請書。这里我不願深責邢公畹同志。我認为党的

領导同志的作风恐怕有所改进才对。

許多非党同志都提出有职无权的問題，我認为这問題不能从具体負責同志解决，应該从党的領导思想上解决。

还要說一下群众对党員的态度。現在一般情况是，群众有話不敢也不願向党員講，当然是怕說錯了，挨整。从党的方面却是个严重的問題，因为这是和党的群众路綫大相違背的。

事情說的太瑣碎了，总結一下吧。

由于以上的原因，群众見了党員往往随便应付，說些不关痛痒的話。表面上說共产党員很好，实际是对許多党員很有意見。这些情况又恰恰是党員彙报不上去的。党与群众有了距离，群众不覚得党員是他最可信賴的知心朋友了，这不就是很大的問題了么？群众再認为党員都有特权，工資高，权力大，本領不强，这不就是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了么？

好了，我不要再写了。希望我这些意見，能作为党的参考。也許很不对，但我覚得以我和党的关系来說，我是不能不写的。

（中文系講师　朱一玄）

中文系進修教師　張效夏

（一）攻擊黨的領導：　刘校長不学无术，屁也不懂是靠資历吃飯；中外文系的党員以及党支部書記，也都是不学无术，屁也不懂的人，或者象孙昌、閻美璧，据說就是人格墮落，卑鄙无恥，至于中文系主任李何林先生，也是不学无术的人。

大学里因为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官僚主义者不敢横行霸道，农村里更是一团糟，党員是土皇帝，是新社会的悪霸，所以"党的威信在农村里特别降低"，要回到农村帮助进行整风。而且要好好整他們一下，不整不行了，"农村里的党員和国民党軍官差不多"，工人也不敢提意見。

党員都以征服者的面孔出現，入党入团后有好待遇，可以享受特权；团里要的是点头哈腰，打开水的人，要的是"奴才"。

党团員是"吹牛，拍馬"，阿諛奉承，打开水，倒尿壺的人；是不学无术的人；党証是飯碗，是爱人。

蘭州大学校長林迪生，南开大学副校長刘披云，他們都沒有資历，沒有在資本主义国家留过学，也沒有專門的业务知識和科学特长，他們沒有当大学校长的資格，应当讓具有业务專长的教授来当校长，所有一切沒有專业知識的外行都退出学校。

現在的上級党与下級党以及党团員的关系是黑暗的旧社会中的大裙带和小裙带的关系。

群众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党員团員享福在前，吃苦在后。党和团所培养的是奴才，平行四边形，沒有稜角，唯唯諾諾，只会服从的死人和机械人。所培养的是吹牛拍馬，点头哈腰，阿諛諂媚，奉迎，打开水，倒夜壺的人。党組織是宗派統治，它排斥打击任何一个眞正的正直人和最优秀的人，党团員們都是抱着腿子向上爬的諂媚者。党团員伪善，狡猾，阴險毒辣，不学无术，是卫道者，伪君子，皇帝，便衣警察，他們都是利用党員作为手段；而达到自己的可耻目的的騙子。汇报制度是卑鄙，悪劣，背地里陷害人，靠近党团組織的人督是奴顏卑膝，奴性祟拜的可怜相。党团員之間的相处，是一种个人崇拜，互相吹捧，搞宗派。党群关系是統治者与被統治者的关系。由于我是一个优秀正直的人，所以我被長期的打击，排斥在党团組織以外。在生活的任何角落里都充滿着宗派統治，到处都是党团組織包办代替，沒有眞正的民主，就是党团內部也沒有眞正的民主，那里只有一些人統治另一些人，一些人只是服从，他們都是違背着自己的良心举手說話。

党的群众关系，是新的人事关系，党員总喜欢培养自己的阿諛諂媚奉迎拍馬者，因为自己不向党团員奉迎，拍馬所以自己也就长期的被排斥打击，不能入团。每个党員都希望有一个人抱着他的腿子向上爬，吃得开。一个人只要点头哈腰用各种方式阿諛奉迎，就可以加入党团組織里去，我是最优秀的人，最有希望的青年，如果象我这样的人不能入团，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团員应該开除团籍。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胡耀邦的报告是教条主义的东西，因为他在自己的报告里沒有痛斥自己一貫

所痛恨的团的宗派統治和宗派打击。团是束縛青年的思想自由和个性发展的組織。

共产党員老是以征服者的面孔出現在群众面前，叫群众象奴才一样的服服貼貼的服从他。但自己由于没有作他們的征服者和服从者，所以就处处受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向来以狂风暴雨整人的，而現在又說和风細雨的整风，这是由党感到問題已經严重才这样提的。我可不能和风細雨；我一定要整倒一些共产党員。現在高等学校和城市机关还好些，而在农村里問題更严重，在那里跟国民党时的黑暗統治一样，共产党員們簡直象是土皇帝，农民是臣子，他們跟国民党的軍官一样横行覇道，农民都是敢怒而不敢言，这一次农民可要起来了，他們要拿起鋤头包圍乡政府，他們要造反，我要振臂高呼組織和領导他們反对共产党。

（二）**攻擊馬列主義：** 中国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是播送教条主义的根据地，人民大学培养出了許多年青的教条主义者。馬列主义本身就是教条主义的东西，他使人們的腦子殭化，停滞。

人民日报在这次运动中已經显得落后了，反映問題不尖銳，不大胆，不敢反映一些具有强烈反共色采的意見，因此讀起来叫人不过癮。人民日报的編輯及編輯部的人們，都是包庇中国共产党的缺点和共产党內的三害分子，不敢揭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反映問題尖銳，大胆，讀起来过癮。

（三）**攻擊肅反和思想改造：** 我对肅反运动本身没有意見，对执行办法是不是有問題应該考虑。如果是执行錯了，为什么在全国范圍內都执行錯了？因为我怀疑这个政策。我認为說怪話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我在班上常說怪話，但我是好人。斗爭的方法应該彻底破产，对地主斗爭是可以，对同志斗爭那是幼稚的。党内思想水平高的人，掌握政策是好的。

我还承認肅反成績是主要的。我們班斗了六个，三个就是反革命，事先材料都掌握了。但那三个人还未交代，其中一个是我很好的同学，以后見面也不說話，看起来値得同情的，这不能說成是立場問題。

我們不能把反革命搞出得少，說成是成績小，应該从整个的傾向来看。肅反的方法不太好，随便的怀疑是不对的。

我并不否認对反革命进行斗爭，但是我完全不同意說斗爭錯了是不可避免。把所有的斗爭都說錯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全国錯誤这样普遍，我并没有假設，我声明我根本没有‘假設’，我同意的是：为什么錯誤是这样普遍。

我非常拥护这个肅反，就是这个方式怎样把反革命份子提出来，肅反执行政策是怎么样？为什么錯誤的普遍性是这样大？

我現在仍然怀疑肅反的政策。党的政策要是正确的，党員执行就应該是正确的，然而我們看到执行是錯誤的人仍是党員多，因此，我怀疑政策的下达有錯誤。

肅反在学校里也很糟，蘭州大学就私設公堂，逼供……我班肅反就是几个党团員先准备好，同学們圍一个圈，把有問題的抓过来，大家拼命地吼，有的嗓子喊啞了，有的嚇坏了，有的人被整了，背上永远的包袱，含羞終身。

我也曾一再强調說，共产党員、青年团員私設公堂，如于云航事件……。

接紙条在肅反中宽枉和斗錯了許多好人，使他們的心灵深处蒙受創伤和耻辱，揹一輩子，最后一直含羞而进入墳墓。在肅反中对反革命分子呼口号是幼稚可笑神經質，这种斗爭方式以后应当彻底破产。在肅反过程中共产党員們私設公堂，几个共产党員弄在一起，把一个人拉到背后大家斗他，逼供他。肅反运动是一片恐怖，是非人道主义的，肅反运动使人与人之間的关系变得冷清没有感情。我看了‘巨大悲剧’。他(指程京）有兩个象对照，非常可怕，我非常生气，認为对这样一个天才摧殘是残酷的思想改造。党委解釋我不滿意，我90%認为是思想改造搞的。

如果稍微有些人道主义精神的，就应該同情（程京），有些人說他原来是个瘋子，或因为搞恋爱的結果，我不同意，如果思想改造把人搞成这样，那有什么成績？希望能把这件事很好地交待。

程京事件是由慘酷，野蠻，粗暴的思想改造所逼成的，……太卑鄙了，太可耻，太气人了，必須为程京事件和党斗爭到底。……这是对人

民的摧殘和天才的扼杀。

思想改造把一些活潑的青年人变成了沒有稜角的死人，使他們未老先衰，思想改造用的是法西斯式的高压和强制，它摧殘人的个性，使人都成为統一的个性，成为一个模样的人，限制了个性的发展。

（四）攻擊黨的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 檔案一定要公开，人事鑑定公开。人事制度是把头制。現在只有共产党員，共青团員和那些經常抱着党团員的腿子，給共产党員打开水，提尿壺的人方能吃得开，現在把人分成四等，最吃得开的是共产党員，其次是共青团員，再其次是民主党派人士，最后才是群众，現在到处都是党团員的天下，不是党团員的群众只能遭到打击，排擠和报复，并且在任何部門都要插进去一些共产党員和共青团員，就是連宿舍都是这样的，这是对群众进行警察式的监視。在工作中只有党团員才被重視和提拔，群众根本不被重視。在各个工作崗位上的党員都是老粗，沒有学問沒有理論的人。以后提拔干部，应强調业务，政治次之。

（五）攻擊農業合作化和統購統銷政策： 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不大，把农民限止得太死不自由，因此农民生产热情不高，生活沒有提高。

統購統銷把农民的余粮全購完了，农民吃的白面少，杂粮多，吃的肉也少，因此，农民对共产党有不滿情緒。

（六）攻擊人民民主制度： 人民代表不是眞正人民选举出来的，而是上級指定几个人派到所代表的地方去，然后再叫群众写票选举，表面上是选举而实际上是委派去的，这不是眞正的民主。只有在資本主义国家內才有眞正的民主和自由。我們要爭取眞正的民主和自由。

民主集中制往往片面强調集中，沒有什么基础是一种歪曲运用。

国际和国內环境問題，由于有阶級斗爭，專政用得較多，民主沒能好很的发揮。

數學系助教 閻樹棟

（一）攻擊黨的領導

“既然三害是普遍的，長期的，能不能仅仅是几个党員或少数干部的問題。要解决問題（指三害）要从上而下，从下而上，来个全民性的檢查、整风。大字报上强調下边有問題，上边正确，我認为不只下边干部有問題，党中央也有問題。”

“苏联有个人崇拜，中国是否也有个人崇拜，在少数民族的許多歌曲中，歌唱毛主席給我們带来了什么什么，派来了什么什么，这是否有些过分？”

“日本沒有共产党的領导，也不开会，而科学倒发展得非常快；美国經济、科学、文化的水平很高，虽然資本主义制度不好，但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学习。”

“科学受馬列主义的約束，因此不能发展，党要象导师一样的指出路綫来，才能領导科学，否則不能。”

“有些学术上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变成了‘木头人，扩音器’，担任一些有职无权的行政領导职务；單凭老的斗爭經驗是不够的。”

“党的領导我不反对，如果領导不好，就要下台。”

“儲安平的党天下問題，不是絕对的，要看普遍的。以南大为例，領导普遍的用党員，但才能是否适合工作性質。”

“复旦大学党委已退出学校，南开大学也可以考慮。”

“把共产党整垮了怎么办？由誰来領导？我考慮了很久，右派分子改組党的說法在我思想中也有这想法，認为比較成熟的办法是各民主党派联合參政，联合領导，否則中国就很危險。”

“現在衡量人的标准第一条是：是否是党团員，有些人学得好，而非党团員，就被視为單純技术观点，加以鄙視，这一风气在教师中也存在，同学对非团員教师有些疏远，不用功学习吧，来回动的人倒可以得到信任。”

“中共应該再虛心些，过去作事是聊以自慰，应該从群众来衡量，作事要多征求同志的意見，提反面意見并不一定是造反，过去对这些事我都表示沉默。”

“解放后，党团員把我变成了一瓶酒，一口袋花生米的狀态，青年

人过去太老实，提反面意見太多，对不合理的現象，应当敢説敢罵。"

"落后的人并不是木头人，有独立思考能力；报紙上所表揚的人，都是順着党說話的人。"

"程京情况你們不了解，我住在东楼，我了解情况，不象党説的經常有人照顧，我从来沒有看見有人照顧。"

"我的命运为几个人掌握，在工資問題上我是不合理中的不理。"

"党支部喜欢拍馬的人。"

"踢球的小伙子們都恨党員，常把球当作党員，先大罵一声，然后才狠狠一脚踢出去。"

（二）攻擊馬列主義

"事物是发展的，昨天对的，今天不一定对，今天对的明天不一定对，过去認为对的，今天都錯了，对馬列主义我以前沒有研究，二十大以后对于馬列主义是否正确发生怀疑，过去斯大林的言論是公式定义，現在分文不值，眞正的眞理不能轉180°的大弯，斯大林个人影响經济学发展，一个人左右整个科学部門。当时思想混乱，怀疑斯大林是否創造性的发展，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功过的估計是阿Q精神，甚至連他自已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了。"

"討論問題不应有立場，否則是非分不清楚；談問題要講立場，就象一个人要自已揪着自已头发离开地球一样。眞理愈辯愈明，不应該受立場的限制，眞理应当有一个沒有立場的客观标准，如古代的斯巴达，雅典的哲学家爭論非常激烈，也能解决問題，但是他們沒有什么阶級立場。强調立場就与鳴放有矛盾，这样輕則約束独立思考，重則違背事实。"

"政治輔导員作用不大，是否仍有設立的必要？大学里的政治課可以不要了，請一些有鍛煉的人来作作报告可能好些。"

（三）攻擊肅反政策和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的方式是粗暴的；对鎭反是否錯杀了人表示怀疑；肅反是先假定斗爭对象是反革命，然后加以証明。"

（四）攻擊人民民主制度

"民主、自由是天賦的本性，一个人只要不損人利已，完成工作任务，任性些是好的，想干嘛，就干嘛？应当給青年人一定的自由度；現在有机器人的风气，同學們文化生活內容不如解放前丰富，解放后剛一提个性发展馬上收回去了，各种清規戒律，馬列主义政治課是教条，限制了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使青年人逐漸变成木偶，現在要发揮各人的特长、积极性是不可能的。"

"学生的班干部及人民代表的选举不民主，同意大字报提出的改选人民代表的意見。"

"青年思想应解放，怎么样解放呢？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扩大民主、自由！所謂自上而下，是上面支持給三害有力的打击，自下而上是：意見可以越級提，过去虽然可以这样做，但是不够。"

"匈牙利青年是有血气的。"

"我以前生活有二个目的？一为社会主义服务，一为桃李滿天下，現在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沒有了，因为有几件使我非常寒心的事。"

數學系助教 章迺漢

（一）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攻擊

"三害存在是否与制度有关？如果只是一党專政，是否錯誤必然要产生，改进也不解決根本問題，可以从制度考慮。"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否有缺陷？过去并不意味着人民当家做主，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整风运动也不解决根本問題。"

"思想有信仰自由，彙报制度是侵犯人权，彙报过程就是侵犯。有什么权利干涉別人！应該彻底取消这种特务手法，它違反宪法的规定。

彙报制度是特务手法，是侵犯人权，違反宪法，与国民党相类似，有些人拿彙报别人的缺点加以夸大，做为自已晋升的資本。”

提出問題：除了工人阶級思想外，其它思想是否均在批判之列？既然有信仰自由，为什么一定要学政治課？”

“匈牙利青年是好样的、勇敢的。匈牙利解决問題很痛快，中国若无此次运动也会有匈牙利事件，如果我在匈牙利也保証不了不拿起槍桿。”

“現在的社会黑暗，民主受到压制，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也把人变成鬼。”

（二）對黨的領導的誣蔑

“在‘西望长安’中，栗晚成一直爬的很高，这說明現在用人并不是‘眞材实学’，看牌子，党員、英雄，个人崇拜势力非常之大。”

“党拚命要人提意見，結果是石沉大海，把提意見当做‘擋箭牌’。”

“分配留学生有99%的是党員，群众中就沒有够得上条件的嗎？裙带关系現在还可以看到。”

“党正象漫画所揭露的那样‘用鷄毛撢的鷄毛一头輕輕的刷自已，而另一头（竹棒）狠狠的打击別人。”

“党委書記、市长沒有必要参加体力劳动，这根本是敎条，这根本不可能与工农結合，只是作表面上的事情，对思想簡單的人可以馬馬虎虎的騙过去。”

“我認为党是一个为自已利益的自私集团。”

“他們（指党）会发明名詞‘大民主’‘小民主’，我也可以发明一个‘大裙带’、‘小裙带’，你們来学吧！我在思想上就認为內部矛盾主要产生于共产党腐化，脫离了人民。”

“共产党要完了，越要完越殘暴。”

“党在科学文化上的成績不大，系里工作强調政治条件，学术空气不濃，同意党委退出学校，外行不能領导內行，不学无术的人退出学校。”

“小日本的科学家不开会，人家科学发展得很快，党給于科学文化上一个很大的限制，几年来看不出党領导的科学文化有什么成績。”

“劳动并沒有被重視，科学院的人所追求的是所长，辛勤学习的人被扣上單純技术观点，有些不学无术、吹牛拍馬的人，倒很有前途。”

“系主任有职无权是傀儡，党支部把持系，我眞不了解傀儡活着有什么意思。背后黑暗势力在支持閻光耀，系里有拍馬屁的作风，这是胡国定的‘阶級感情’所造成的。”

“系內党員有优越条件，系对助敎人格不尊重，助敎人格便宜。系內党支部有宗派主义，对一般群众照顧少，党員升級快，工資高。我到老也开不了課，我能开也不行，党員才能开。

（三）對思想改造、肅反、反右派鬥爭的攻擊

思想改造的方式是粗暴的，不解决根本問題，眞正的思想解决不了，仅仅压了回去，以后不再散布而已，程京問題認为搞的过火了，有些殘忍，都是党团員搞的。

鎮反中小王庄槍斃了很多人，其中不少是搞錯了。

肅反是先假定斗爭对象是反革命，然后再加以証明。肅反方式不恰当，群众斗爭方式太殘酷，給以精神压力，未免寃枉好人。

胡风是思想問題，文艺問題。三批材料不足以証明胡风是反革命。胡风反革命行动沒有什么表現。法制不健全。党中央有宗派主义，排挤胡风。

鳴放应当站在兩个立場上，同一个立場就沒有什么可鳴可放的了。

对刘校长报告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一下子由內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算了，以后不提什么意見了，也无心参加反右派斗爭，到底有沒有右派还成問題，党在故弄玄虛。

人民日报社論阻止鳴放，工人知識不足，头腦簡單（指“工人說話了”一文），怀疑党是否有决心改正錯誤，党員在整风中作群众的尾巴，为什么党員不給党提意見？

大鳴大放，将来免不了有第二次肃反，那时誰能保証不是被斗对象。

关于盧郁文的匿名信事件，章說："你們不要相信，信还知是誰写的呢？"

学生貼大字报是进入新的历史范疇，有"五四"精神。

在剛开始反右派时，他認为："教师中問題不比学生問題少，不談出来，問題仍然存在。"認为"鳴放連开始都没有开始，人民日报社論結論过早。党天下确实有事实，問題还没有継續暴露，不說也在腦子里存在。助教不敢鳴放有問題，怕把飯碗砸了。

物理系助教　陳本敬

大鳴大放时說"这下要变天了，民主党派会上台，共产党会逐漸挤下去，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已完成"。"出大字报的目的在于为第二个五四运动出把力"。"要搞垮共产党不能用武力，也不能用政党，只有順着他，捧他，讓他腐化，逐漸人們心心相印，不拥护他的时候，一搞就垮"。"我实在不是搞社会科学的，不然我將要研究到共产主义是否还有另一条道路，我想国外一定有人研究这問題"。"搞政治太危險，斗不过別人就会完蛋，只有搞自然科学的人好，不管什么社会也不会太坏"。

"鉄托的談話是对的，中国和苏联都是把馬列主义学教条了，斯大林也是这教条主义产生的。开学习'再論'的会大家都不說心里話，只能說好的去粉飾太平"。"学习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再論'学了压不服大家，又来了一个新花样。內部矛盾主要产生于共产党腐化，脫离了人民"。

"我觉得共产党眞会看事，知道自己的政策不对，这下可以来一个的合乎人民需要'的大鳴大放，將来大概会自由得多了"。"我幻想过民主党派以后与共产党对峙，共产党就不能'一党專政'了"。

"在反右派开始时我認为共产党耍花样，故意制造一个恐吓信，以作反右派的藉口。有没有党天下共产党应自己檢查，看全国失业的人口中有没有一个党員？再看留苏学生中又有多少是党員？右派分子一个个被打下去了心中还不胜挽惜"。"共产党是以力服人，不讓人民說話，所以人民就象康熙皇帝，处处說他是当家作主，但一句話也不敢說，党好比慈禧太后，积极分子好比李蓮英"。"現在的右派分子認錯是不得已，象加利略的教会里認錯一样"。"現在什么事都是引經据典，要依据馬列主义，正象中世紀时引用圣經一样"。"元朝时將人民鎮压得那样厉害也維持了七十年，何况現在只有几个知識分子反对，共产党也至少得三百年"。"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已經完成，將来的发展或者是共产党来合乎人民要求，制定出新的制度，这样也可以継續成为革命的領导者把，否則將会被民主党派挤下去，自己也願为这样运动出把力"。

"共产党耍花样，先要人提意見，現在又来整，这是釣金龟，我連报都不願意看"。

"'第二个五四运动'將会对中国有很大的改变，科学上也將得到改变，心里幻想校委治校，否定党委制。科学院說不定也会下放到学校来，象別的資本主义国家一样大学是科学文化的中心。我認为共产党没有能力領导才走了以前的一段弯路"。"以后学生的培养專門选擇天才生"。"以后將开放人才及仪器的自由市場"。

"解放后科学没有发展"。"外行領导內行，把科学搞得一团糟"。"南开大学固体專門化是非重点的六次方"。

"党团員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他們什么都不行，才找依靠的"。"团員不如我，还配得上管我"。"我讚同有一个同学說：管得这样紧，眞象希特勒一样"。"大家都裝腔作勢，没有人情，我甚至討厌国营商店的售貨員"。"少先队也是將来的'压迫阶級'"。

他对兩个右派分子說"很多品質坏的人，都善于走政治路綫，不过你們不要被党团員知道了，否則給你記下来，到一天算总帳"。

"党員团員是新型的剝削阶級"。"党团員是新的压迫阶級"。

"希望以后发展党团員，注意道德品質，品質不好的人不要吸收"。"人与人之間没有感情，我讚同右派分子丁守歉搬来的大学报中罗蘭的

話：‘現在沒有伸張正义的人’，对任何事务都可怀疑。我很同情林希翎”。

“好好工作的人現在都認为是坏人，不好好工作的人只要走政治路綫也会到处吃香”。

“虚无主义是什么？青年人好象是属于虚伪主义，小資产阶級的暴露”。

“新社会没有自由、没有民主”。“說話也要提防，否则要被出卖”。“在政治空气濃厚的学校上学就学不好”。

“新社会人与人之間没有溫暖，没有友誼，我感到孤苦伶仃”。“在新社会没有拔刀相助的人”。

“我很討厌学政治課，它把学生时間都耽誤了，馬列主义根本没有用处，我背都背得下来，但从来都没有用过”。

“我对專門搞政治的人没有同情心，但对学生有，如人大之林某，我就怀疑她是否发現了眞理，而扣他一个毒草的名，我認为应讓他成长，比如对政治課有什么不可以怀疑呢？任何事物都可以怀疑”。“把馬列主义做为指导思想是荒謬的”。

“在肃反时有些人明知有錯不敢講，現在也可能有这种情形，应該改变这种情况”。

“不得了，每年都要搞运动，浪費不少时間，还能搞什么科学研究”？

“右派就是右派，有什么了不起，頂多升不了級，少拿点工資”。

陳本敬、閻樹棟、章迺漢反動小集團的兩張大字報

第一張大字报：

1. 反对外行領导內行。
2. 要求人事材料公开。
3. 要求有科学研究及图書、仪器。
4. 要求重視青年教师。
5. 要国务院像重視工业一样的重視科学。
6. 反对將工农速中的学生保送入大学。

7. 反对党团員有特殊权利的大裙带关系。

第二張大字报：

人民呼聲

爭自由、爭民主、爭人权

打碎黑罐撕破黑带，反对愚民政策，实行信仰自由，支持同学的意見，选修政治課。

要求通过眞正的民主，选举人民代表；反对包办式的选举制。

对祖国科学事业負責，对青年負責；反对留助教，派留学生、升等升級，开課重德不重才的卑鄙制度。

給青年助教以合理工資待遇。反对把头制；不学无术的人退出学校的領导地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們不要沉默了，讓我們參加到同学們的斗爭行列中去！

物理系助教研究生　蔡戴熙、靳　健、楊福徵反動小集團

（一）大字報

（1）“我們要擴大民主”：

1.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据現有的材料不足以証明为反革命。
2. 对高饒事件，我們知道的更少，这样我們也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反革命？
3. 反对搞思想工作中“以力服人”粗暴办法教育人們！不要把抱有“正流”观念不同見解的人，看作異教徒，而施以各种形式的压力。

（2）“嗚呼！大失所望”

1. 嗚呼！大失所望！党委的整风計划在那里？决心在那里？
2. 我們要重新对肃反进行估价。
3. 学生会应眞正的代表同学們的意見。
4. 立即召开全校师生職工大会，保証言論自由，决不报复打击。

5. 立刻开辟大礼堂作为自由講坛。

（3）答數四的幾位同學

① 关于"高饒"問題的进一步闡述；

要求对这一事件作进一步說明，怎能說是命令党这样或那样呢？

正如物一同学所指的那样党和行政，是有区别的，党內的事情不应和行政的事情混为一談，党可以处分一个党員（开除党籍）但是作为一个公民，而且过去是領导人被定罪被解除行政职务难道这只是党內的事情嗎？另外一些公民就不能过問嗎？过問了就定一个命令党"这样那样"的罪嗎；

② 关于北大校友来校問題

对这一事件看法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你們无权干涉，至于說北大校友来校这和我們有什么关系？

③ 我校的領导沒有"以力服人"的事嗎？你們四年来遇到的尽是"以理服人"嗎？可举的例子太多啦，順笔写来；

（1）思想改造时刚回国的滿腔热情的某教授（是个博士学位的获得者）由于工作不細緻方式粗暴，弄的精神失常，到現在不能开課这不是"以力服人"嗎？

（2）肅反中我班班長被一口咬定是反革命分子，制造一些虛假的罪名（他曾檢举別人的材料，結果被肅委会压下，反扣假檢举大帽）結果証明斗錯了。是不是"以力服人"？

物理系助教及研究生

曹賢康　黃学崇　徐元上　譚华舒　蔡戴熙　楊福徵

靳　健　錢燦圭

（二）蔡 戴 熙

"我們的人权自由是沒有完全受到保証的。肅反在成績和錯誤的估計上，我認有成績是小的，錯誤是大的，化学系在肅反中斗了百分之四十，結果反革命是个"零"（按：与事实完全不符），随便斗人是侵犯人权的""我們是不自由的，在肅反中組織上叫我們斗，我們相信組織

就斗了，如不发言的話，支書就說历史有問題。""程京教授回祖国来，最低限度也是个爱国者，而学校则"以力服人"进行思想改造，而造成严重后果"。

"我觉得不管是香花还是毒草都沒有理由阻止它。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权利对別人的意見批評，可是如果不讓人家說話我就觉得这是压制。而且存在这么样一种傾向，觉得意見越多越好，越高兴，表示整风越徹底"。

"我們不明白党中央整风鳴放的决定是否在南大也适用，馬列主义不是告訴我們要勇于暴露矛盾克服矛盾才能获得进步嗎，我們要求領导上打消顧虑，大胆支持鳴放，不要怕出乱子，群众会保护我們的社会主义的，不要認为只有几个領导干部才能保卫我們的祖国………"

"先扣帽子后批評会影响鳴放。我觉得先要讓发言者繼續闡述他的論点，我們来分析，然后再扣帽子不迟，不然誰也不敢說話。我同意給写匿名信的以有力的回击，因为这本来就只有別有用心的人才这样，偷偷摸摸的人才这样做。我認为現在应該讓儲安平繼續闡述他的論点然后再討論不迟，如果儲安平同意陈新桂对他的論点的发揮，那末儲的发言是属于反社会主义的，如果这样我就同意对他扣这个帽子"。

"現在思想沒有自由，随便說一句与領导（实际上是党）意見不一的話就得遭到有組織的群众性的批評。我想，信仰一件东西，信仰一个主义，信不信由人家，只要他不推翻政权就誰也不能斗爭他，不然就是沒有自由。对于一个主义的信仰，对于某一人的要求都应該是他自願的。我要參加党，那我就对自已可以这样要求，我不參加別人就不能干涉，干涉就是言論不自由"。

"我認为沒有被告当法官。整学校，党委必須由市委出面領导及主持会議，整系一級則由已整风的校一級党委来領导，全校性的問題全校性会議解决，系級問題系級会議解决。"

"我觉得过去党的思想工作及馬列主义之教学簡單化、教条、有时甚至于粗暴。这种教条的思想教育对全校各种工作已起着重要影响，政治課教师拿着笔記本背，这样怎么不叫学生思想僵化呢？从这次譚天榮

来校演講可以充分看出来：对譚天榮的錯誤論点一般的只能給予給个习慣的大帽子，大声嚇嚇二句就算在和人家爭論，而不能你来哲学我用哲学批判。你來具体东西我拿具体东西批判，这样才能使人心服口服。”

“我認为新的說法是正确的。我校肃反成績是小的，錯誤是大的，人权的确沒有受到充分保障，但是这并不等于說当时被斗爭者的本身一点問題也沒有，这一点要分开。說成績是小的主要是因为它这样做是把不是反革命也一起搞了。我觉得按徐滬元先生剛才講的关于工厂如何措理肃反問題（先調查到已經有百分之八九十之后再进行斗爭……）这种做法才是对的，像我們学校就不是这样，未确定前又說材料已經完全掌握但結果又不是反革命，过种斗爭与审訊何異呢？”

“丁的意思認为工人出来說話是不民主，对党提意見并不是对党不滿：百家爭鳴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人民日报的做法可以考虑。只有充分提問題，才能知道缺点所在。对一些恐嚇是并施加压力，在現象揭露后一定是根本問題的討論。所以必須平心靜气的討論，而不能扣帽子，讓大家將意見提出来。”

“搞錯了是搞得不彻底。不交代，不恢复名誉，没有安慰……如果將干部作为反革命处理，則就无人敢搞运动，如違反党的政策則应进行处理”

（三）靳　健

“我們的民主是否够了？我們的人权是否有了保障？我們感到是不够的。在宪法上、法律上是保障了，但实际上是沒有的。”“打蒼蝇可以用蝇拍，用炸彈固然也可以炸死蒼蝇，但必然要伤害別人，肃反这样作代价未免太大了。”“肃反有很多侵犯人权的……有些小組还执行‘司法任务’。”“在肃反問題上，我不同意刘付校长的意見，我認为，成績是小小的，缺点是大大的，人权是不够的，要扩大”。“如果在全国范圍內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对的，那还有百分之零点一是錯的，可能是百分之一就发生在南大”。“据我們了解我校有二百五十人被斗了，而只有八个反革命……，（按：与事实不符）使二百五十人的心灵上受到創伤。”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过去犯了大錯，这种錯誤表現在大国沙文主义，对国內国外不民主，思想統治太严。

“世界共产主义中心——苏联，在过去很多政策是錯誤的，如外交上，各国的党和党之間的关系上，对人民的思想工作上，就必然造成当时的局面，在这以后虽然很多地方改了些，但是不够，尤其在思想工作上不够。那种严重的教条主义，使人民的思想和科学艺术都硬化了。”

“政治是反覆无常，今天說东，明天就說西，而人民則只得盲目地跟着跑。如以前罵南斯拉夫，今天又說他是社会主义。以前把斯大林看成神仙，今天又說他有錯。而有人說斯大林主义，我們說是功过三七开、四六开。我心想“誰知道是怎回事”。对政治理論，我也認为是教条，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經典理論中提出某部份来作人們的这种或那种准繩。政治理論今天只是停留在背誦，解釋和讚美的阶段上，人們不敢提自己的論点，不敢从新的社会情况中去吸取內容、去补充，即或有那也只能是一些偉人，才可以这样。”

“不同意地斯大林錯誤归于群众的惡习，对于政治制度只停留在民主集中制，再进一步具体化就不是所謂的政治制度（經济，全民所有亦相同）。斯大林之錯誤由于不健全的制度所产生，如早上六点起，但有人同时起去鍛煉这都是制度，但不能在說这个或那个制度不好，兩个都去执行。个人崇拜在中国很风行，过去講联共党史整个貫穿个人崇拜思想。”

（四）楊福徵

“葛佩琦說的話不能說不对，因为他的提法有前提，如果‘三害’分子不改的話……”。

“工农的生活提高得很少，但領导干部提高得多（相差太悬殊），他們坐汽車、住洋房，这是一个新型的資产阶級（？），資产阶級是以金錢作資本，而他們是以政治作資本。”

“我恨南开一切人，恨所有的政治干部，假如我有手槍的話，要打死所有的政治干部。”

"肃反的作法太使人胆寒心驚，就是不是被肃的人也有此感，不知那一天也会搞到自己头上。"

"人民日报的'工人說話了'的社論，是領导組織的，工人的話还没有說出来，实际上受'三害'最深的还是工人，不过他們不敢說話罢了。"

"在我們的制度下，沒有民主，班干部是傀儡。"

"政治干部干涉过多，列宁不懂物理，却著作'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一書，这本書不应当作为經典著作。"

"胡风問題是一个錯誤，但有意識的拿他做肃反的序曲。解放前的事不算，傅作义在解放前更反动。"

"弄瘋了程京，麻痺了胡剛复，放走了王治樑。"

"'鋼鉄是怎样煉成的'，怎么也看不下去，对奥斯特洛夫斯基不喜欢，觉得他是吹嘘，喜欢看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我有个理論覚得人死时才說眞話。活得正好的人說的話不太相信，象海鷗，拖拉机站……。"

"苏联国家虽然工业很发达，但生活在那种不自由的国家也没意思。"

"我是黑种人，另一些进步的同学是白种人，因此有种族歧視存在我們之間。"

"建議整风伴随清党，希望党看到右派的大字报就清除党員，以削弱党。"

"思想改造是正統思想对待異教徒。"

× × ×

綠紙貼在紅牆上，
海报作紗窗，
有話講出来，
放在心里悶的慌。

× × ×

有意見，小組提，
群众不滿意，反映不上去，

等于放屁！

× ×

写出来，大家看这样更便当，
大家来爭鳴，百家一齐放。

× ×

紅四樓牆上有自由，
誰是誰非大家說，
帽子不要扣，整风不能收。

未有名　5.27.　（楊福征的大字报）

物理系助教　丁守謙

按：丁守謙自情华园归校后，移来毒草"維护人权"、"公审胡风"、"为历史辯护"、"胡风事件再提"等四篇文章，并以观察者曼（笔名）发表了序曲，兹將它們和討論会上几次发言一并介紹如下。

又："胡风事件再提"笔名和"序曲"一致，而丁守謙却不承認为自已的作品，但根据所揭露，丁所散布关于胡风問題的謬論与此一致，是以有足够的理由証明实属丁守謙所作。

（一）序　曲

观察者趁此暇之余，去訪北大、清华，对这次学生运动作些观察，所接触的人物甚众，所获悉的材料也頗多，为剛剛所知，故暫按下不表。

在清华园的水利館上，貼有四份引人注目的大字报，計有"維护人权"、"公审胡风"、"为历史辯护"、"胡风事件再提"观众絡繹不絕。这几篇文章具有一定的理論水平，并据有較广泛的代表意义，而且据有辯論家的风格（不象詭辯論者或暴力論者那样）（指蛮不講理之意請勿誤解）。而他本身的若干論点，又受到清华校友当場反駁，好一番热閙景象！为避免断章取义，特將原文全部抄下，以飽看官們的眼福，

同时希望由此"抛玉引玉"（因此数文非观察者之拙作，故不能曰"抛磚引玉"），以活跃南开园的空气，的确这里的气氛比起燕园、清华园来嫌太"死寂"了一点。

为了不影响"看官們"的独立思考，"观察者"只將原文介紹，暫不发表評論，这并不意味着"观察者"没有自己的"管見"，本着"真理愈辯愈明的精神"，希望將来能有数場激烈而友好的論战，"观察者"將积极參加。同时引为驕傲的是在"观察者"所从事的研究領域中，曾有过这种光輝的范例——光的波动說和微粒說，經过三百多年的爭鳴后，竟意想不到他在新的基础上得到辯証的統一。

观察者　洛曼启 57.6.5.

（二）維護人權

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反革命份子就一天不会絕跡，經常性的肃反工作和提高警惕是完全必要的。

在这次肃反运动的総結，領导上認为：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但是在我們所了解的三个單位——清华、北大、东北工学院这次被斗、被关、被污蔑、被施以精神拷問的人后来查明有 90% 以上都是好人。譬如北京大学史夢蘭曾宣布反革命份子为百分之几（当然肃反領导不会蠢到規定每个部門都不折不扣地达到百分之五的指数），但是当时宣布这个数字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效果如何？事实証明很多單位被斗被关的人正好都是百分之几（見最近几周的人民日报）。六亿人口的5%，就是三千万，請問短短几个月中全国有百万千万人被斗，被关、被施以精神拷問，而絕大多数是寃枉的，这叫做缺点是个别的嗎？不！这叫做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問題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寃枉的人众多，而且由于它性質的恶劣，人权被蹂躪，宪法被踐踏，法制蕩然，正义无存。

宪法規定："通信秘密受保护"，請問千万人的信件被非法檢查，很多人失去了通信自由，有誰来保护法律，保护我們不受毁謗，可是在肃反期間，調查人們历史时，在亲戚朋友中被誣指为反革命分子的人有

多少?！

法律規定被逮捕的人24小时之內必須送法院，48小时內必須决定是否起訴，但是肃反期間被关的人們你們沒有看到逮捕狀，关了48小时还是4800小时。

是的，我們没有体刑，但是經年禁閉，日夜追逼，揑造事实，誣告恐嚇的人有多少?！多少顆滿怀着青春希望的心，从此沒有了春天，多少双願为社会主义劳动的手，从此麻木而迟頓，多少对情侶被拆散，多少家庭被破坏，多少人至今还禁若寒蟬！还有那些被迫自杀者的鮮血——我們同志的鮮血——想起了令人心疼，他們的血不流在保卫祖国的疆場上，而被自己人杀害。

宪法在那里，人权在那里。

"缺点嗎？嘿嘿！这不过是个別的"。这是徹头徹尾的謊話，它的效果是掩飾那些侵犯人权的份子。

"有反必肃"做得很坚决，我們双手拥护。

"有錯必糾"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吞吞吐吐，欲做还休，是为了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不受損伤嗎？是的，有許多忠誠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他們还不太了解人权的尊严，还不习慣按法律办事，这种人即使委屈了我們，也可以不究既往，但是在肃反中，有不少人是不在此例的，他們挾私仇而揑造事实，捕风捉影，誣陷好人，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們藉此来挾持群众，大显身手，激动諂媚，把别人的血泪作为自己进身的阶梯，他們不在肃反，而在肃好人，不是救国，而是害国，他們是中国的蠹賊，不懲办这些蠹賊，不足以慰地下清白的灵魂，不足以維持宪法的尊严，还有在肃反以后，揣之自危，不敢說話，道理就在于他們目睹許多罪名是莫須有的，所以明知清白，誰敢去惺"莫須有"的刃鋒。簡單的說他們感到公民权利还沒有切实的保障。

我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团員，我爱我的国家，中华民族受尽了磨难，几千年来向来是沒有人权的。解放了好容易爭得了人权，我們不容許这班蠹賊再来破坏它。要知道誣害拉伊克，也害了匈牙利，誣告列宁格勒的医生，不但害了这些医生，也損害了苏联，我国的許多違法乱紀份子

不仅害了許多被誣告者，同样地也使得更多的好人謹小愼微，不敢講話，不敢負責，一部份有利于学术建設，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設的力量因此不能发揮。所以这班蠹賊，是我国民族罪人。維护人权事业也决不是百分之几被害者的事，而是每个人的公民权利有无保障的事。这是全民族的事，是我国社会生活的根本問題之一。

还有我們应当进一步想一想肃反期間，全国那一个地方没有私設的没有法律根据的禁閉室，那一天没有非法的通信檢查，精神拷問；如果没有肃反最高領导方面的默許或縱属，下級干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怎么会如此步調一致？而且不是肃反最高的負責人誰有这么大的胆，竟敢如此主观而謬誤的估計全国反革命份子有百分之几？有誰敢于把这个数字广为傳布，定为大家的学习材料，肃反期間的严重錯誤是有其理論根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阶級斗爭愈尖銳（見55年6月7日罗瑞卿的"提高警惕，反对麻痺"的报告），但是閉着眼睛，不看事实，瞎套理論，闖下了这么大的禍之后，把責任完全推給了一个死了四年的苏联人就完了嗎？

据此，我要求：

（1）重新估价肃反运动，拿出数字来。

（2）尊重人权，尊重法制，作为重要項目，列入党和政府的整风内容，务使每个眞正的公民受到切实的（而不仅是条文上的）法律保障。

（3）从速建立尙不完备的法制。

（4）設立独立的（而不是原班人馬控制的）有实权的国家接待室，受理有关違反法制人权的控告，下决心懲办別有用心的誣告分子，違法乱紀分子（动机純良者不在此例）凡是藉打击好人而入党的必須开除，凡是靠打击好人而升級者，必須降級。

（5）具体負責肃反的高級領导人必須引咎辭职，应負汚蔑宪法的責任。

（6）被汚蔑的好人（无論生者或死者）必須在与当初"斗爭会"相同的会議上为他們洗涮淸白，調査对信口雌黄，血口噴人，以致引起誤解，必須徹底弄淸，道歉云云則大可不必。

非如此，不足以正国紀，非如此，不足以申正义，非如此，不足以提高党的威信。

罗　蘭

（三）公審胡風

胡风案件，曾掀起了全国性的运动，我們都曾參加过这个运动，但是我始終覚得仅仅把公布的材料来証明胡风集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是很不充分的。

反胡风的文件，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其中最重要的是胡风集团的信件及其按語，我們試溫好一下，

1．"信中……我們会胜利，但那过程并不簡單罢，我想，还得更沉着，更用力，以五年为期并不算悲观。小利要弄得好点才是……（50年初的信）"磨我的劍……窺伺方向""且打滚，且作战"

他們所謂方向是什么，所謂进攻胜利又是什么呢？这些問題的解答，是判定胡风集团性質的根本关鍵，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以后簡称"材料"）按語說，他們进攻的对象是革命，是人民政权，而反革命复辟的时期需要五年"但是縱观全篇材料，这种判断是欠缺直接根据的：（相隔差不多就是五年）。

"这里情况在动搖中，第一，作协党組連日在开会，大概由先生們自己檢查，提出汇报，中央再来最后考虑問題……甚至（胡风）給中央二十万字的东西要出版了，如果眞是这样，大概是上面已經决定了要徹底考虑（P78）"缺口已打开了（缺口指作协檢查文艺报的錯誤）"（79）"我发了言，文艺报的問題不是孤立的，为領导"傾向表現之一的庸俗社会学，美学上表現之一是形式主义，（P80）宗派和軍閥統治。

可見他們反对的是当时文艺領导占統治地位的文艺理論。他們进攻的直接对象是这些，这是无疑义的。他們的目的有没有可能是藉錯誤的文艺理論，錯誤的作家組織方法来戕害文艺界，来損害革命呢？是的，有可能，但从材料中找不出直接的根据。相反的，如果你仔細的研究一下

胡风的“二十万言”再留心一下整风以来各文艺刊物上的討論和批評，你会发現胡风的許多意見今天正在討論中，并不是大逆不道的东西，他的有些主張，我已經采納，而且，如果胡风的最終目的是推翻人民民主政权，那么他要写”如果他（周恩来）和你見面（謝韜）你的意見也会对他有影响的（P66）”为什么他要以給党中央的报告作为斗爭的主要武器呢？为什么他极力爭取中央的支持呢，这需要解釋。

所以持着科学的态度看这些的話，应当說明胡风集团的目的可能是反对人民民主專政，也可能只是为了实現他們的文艺理想，这需要进一步探討才能下断語，这个大前题既如此，那么胡风集团用那些刻薄駡人語以及偷看党內文件也就并不可能为反革命目的服务，而可能是他的不擇手段或品質的惡劣。

2.政治历史問題：

在解放前利用私人关系保出某一个被逮捕的人是常丰，故胡风保出賈植芳也并不稀奇。

……阿隴、綠原、方然曾是反革命，但材料并沒有說出究竟干了那些罪惡勾当，說胡风在日本时干了些不可告人之勾当（P 59），我們知道蔣介石的一切政治工作都是从建立买办官僚專政为目的，都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这里按着具体的活动、职位，出入很大，仅說“反共工作”“不可告人”未免过于籠統，而且胡风集团人数很多，不等于反革命集团。

3.已公布的最重要的分析胡风集团罪行的材料是“按語”，但是，这里有些地方还值得商榷，兹举一例……今天中国，人还是不遵敬人的，人还是污損人的。“而按語分析为上人指革命的人，下人指反革命的”（P123）这种按語是为胡风集团反革命的罪行的分析提出来的，也是我們当时我們学习的材料，如果有人責备我們深文周納，故入人罪，我們將何以对，如果把它公諸于全世界，豈不为仇我者作把柄，为亲我者痛心。

4.有人說：胡风若不組織集团，也是可以爭鳴的，这种說法似乎不尽恰当，要知道集团二字本身不是什么坏字眼；分散的人进行反革命活动，我們不因他是个人不叫他反革命。同样，不以反革命为目的集团也

不能因它是集团而叫它为反革命，不在于“集团”或“个人”而在于活动的目的。在二十世紀，要貫彻任何一种主張，实現任何一种理想，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努力是不可能的，宪法規定人民有結社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有何不可。

总之，在胡风周圍，曾聚集了一个宗派主义的集团，他們有自己的文艺理想，反对当时文艺界的另一部分人，并且用詞极为刻薄，缺乏同志式的态度，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反革命”他們有嫌疑，有重大的嫌疑，但是已經公布的材料却不足以構成充分的法律根据——这是我的看法。

六十年以前法国有个炮兵尉官叫德莱非斯的，被陆軍当局誣告为德国間諜，被判在魔鬼島上終身监禁，判刑的根据是不充分的，在法国国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全国分为兩派，一派硬說是德国間諜，一派則主張彻底調査，重新宣判，多少人与这小小的下級軍官无亲无故，放下了自己的工作，甚至丢弃了自己的职位，为他奔走呼吁，偉大的作家爱彌儿、左拉、安那托儿、法郎士都奋起主持正义，左拉因此被判徒刑，迫得他逃到英国去，为此被迫逃亡的人不知有多少，經历了十二年之久，經历了无数波折，冤獄終于平反，德莱非斯的确是清白无辜的，法国的資本主义社会我們不要它，但是法国人这种追求眞理，为正义前撲后繼，不惜牺牲的精神是偉大的，当然任何比喻都有些跛足的，我无意于把胡风比作德莱非斯，更无意于把人民民主政权比为資产阶級政府，在“反胡风”学习中（或者在斗爭某一个人时）明明白白有些历史清清白白的人，他們都口是心非随波逐流，連哼都不敢哼一声，这种斤斤于个人安危，不去探求眞理的心理是知識分子的耻辱，是我国的可憂虑的現象（斯大林后期的錯誤，苏共中央委員会不是不知道，但是象赫魯曉夫这样有魄力，有勇气的人都覚得对此无能为力，为什么一个全国性的錯誤在一个长的历史期中二万万苏联公民中竟沒有一个看出錯誤，竟沒有一个有勇气指出錯誤！这难道不也是可憂虑的現象嗎？毫无問題生产資料公有化沒有錯，現代化的生产也要求一定的自上而下的領导，錯在那里呢？这是值得深思的，有暇我当发表我的看法。

有远見的人士將会看到，胡风問題的彻底解决——即拿出确凿的証据来重重地判他反革命罪，或者确是宗派集团，判他刑事罪（如果有的話）——这对于广开言路釋群疑，解除許多不敢講話的人的顧虑，將会有莫大的好处，据此，我要求：及早公布起訴的全部根据。

公开审判胡风！

我得知写按語的决非等閑之輩，我也深深地敬爱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革命領袖，但是真理不許我緘默。我当然欢迎支持我的同志，但如果有誰能駁倒我的論点，把我的疑团解除，我將至为感激。但是在"駁"以前，务請先冷靜的重讀一下"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胡风对文艺問題的意見"（即卅万言）（曾公开发行）以及最近的文艺問題討論，这样才会有討論的基础。

（四）為歷史辯護

——致罗蘭同志——

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都采用必要的手段来对付它的反动派，这是由历史本身所証明了的。

如証据确鑿胡风是反革命，那无話可說，如果証据不够，法律学上不能構成胡风的罪行那同样无話可說，我的理由如下。

一、胡风的組織发展到几百人，在社会动乱时期霸佔文坛控制了部分出版事业（如臧克家的詩集要牛汉批准才准发表）即使它是文艺流派但已在事实上成为反革命的拌脚石，野心昭然若揭，因之执政党可用暴力的办法拔掉它，不受法律条文的約束（甚至宪法）历史上这种事情屡見不鮮，然而崇拜法律的人，看不到这个社会规律，看不到党派及阶級斗爭的超法律性。

二、作为統治阶級，有它的共同的和不同的性格，它的共同性格之一就是在取得政权之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来消灭并鎮压反对派，以确保自己的天下，正因为迅速，而且残酷，所以宽死鬼必不可免，如果懂得这个規律，他們在九泉之下，应該欣然瞑目，共产党比任何一个朝代的統治者都要偉大，因为这个朝代宽死鬼最少，而又是为了大多数人的而死的………在苏联曾經有个同样理論的人，結果也不辜被捕，不

知是否他曾愉快地死去"見斯大林时代"一書"文汇报（3月份）有节譯，請人們看一看迭更斯的双城記"，再看看中国史書和西洋史書，就要摸透革命过程的特性，慢然醒悟而不激，怒髮冲冠得帽子都要飞了。

三、政治生活是冷酷无情的，它往往用藍色的手段，来达到紅色的目的，它排斥人道主义和人权 ……等糊塗到聳人听聞的說法，請問諸位，听到那位共产党員同志說过"人道"和"人权"这样的話嗎？沒有，因为执政党是不相信"托尔斯泰主义中的爱和善的意旨"，而只相信馬列主义。

〔但提倡革命的人道主义也就是从托尔斯泰，罗曼.罗蘭，高尔基的作品中吸取来的，請新校友評〕

四，近来文艺界的討論，似乎重調了某些胡风的看法，（如导演中心，制片小組，刊物独立等都是与胡风意見書暗合）但这是反文艺界自发要求呢？还是胡风的功劳或者是故意說成是党的政策？却不甚了解，有待于討論。

此致

敬礼

（我已看过了有关材料）

S. C.　2月30日

註：上面的評語有的写評語者弄在当場发表了演說，闡述了他們的評語。

（五）胡風事件再提

…………但繼之以后，只有一个逮捕狀作为結語，沒有办法作为結束。

第三批材料証明胡风和阿隴，綠原，方然……（以前干过反革命的）有过通信关系和其他关系，但是我反对用"連坐法"的法律方式來滿門抄斬。"………罗蘭有充分的理由来怀疑，因为他是一个不明眞象者，当然他对摘帽子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本人提出公审胡风是及时的。"

我們不願意只知其家，而不知其国，我們要管国家的一切事务，

使“国家的主人”这个字眼更充实。

胡风在以前在文艺理論上是和一些党員及一些人的意見是分岐的，他自己曾說“我年青时候痛切地感到庸俗的机械論的危害，因而他在創造实現中，追求用新的現实主义，用新的方法研究社会主义，所以他特别反对何其芳，林默涵，周揚等人的文艺观点，而且他們在感情上也是不太融洽的，这些可以反映在材料的一些信扎中，他在重庆搞文艺工作时，他反对一些只适合于解放区的文艺理論，因而他們之間在現实主义和社会現实主义之間創作方法和世界观之間发生了激烈的論战，他的观点是与一些党員作家有分歧的。（这些在現在看来是不足为奇的，而且鼓励这种爭鳴精神，但是在第一批材料中，就指責为“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运动，教条主义者就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邏輯来加于反对者的头上”，可是胡风在同他們的論战中，并沒有对整个党的瘋狂攻击，而只是对几个党員作家进行学术性的辯論。

正因为胡风沒有追随某些教条主义者，所以自己在探求对現实主义新的理論上考虑了一些問題，也就有一套新的看法，要在創作实踐中达到馬克思主义者。在群众中起了一定的影响。在实踐中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可惜却被人指責为“披着馬列主义外衣的阴謀家，”假如馬克斯主义者是眞貨，它是战斗的，决不是教条主义，那么自己以为是眞貨馬列主义就大胆跑出来战斗，决个你雌吾雄。但是一些教条主义者沒有这么作（解放前作过）解放后只运用統治的棍子来对具有反面意見的人照打，这現象是极普遍的。解放后，胡风虽然在北京工作，但是在某些領导者心中还是个異己分子，在 1953 年进行知識分子改造时，何其芳、林默涵二人写了兩篇文章批判了他的文艺观点，以后他也作了書面檢討，但是某些領导者从領导地位，非但沒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却对他是另眼相对，他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宗派情緒（以前已有，人較少）收集了一些文艺观点相同的人（当然也摻雜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由于党的宗派主义較濃，所以他的宗派情緒更有了发展。不过在 1953—1954 年底由于林、何的兩篇文章，他的确就当前文艺界面临的問題作了研究，因而也較深入較全面地写了长卅万字的意見書，

（包括林、何的反对，批評和工作建議）在态度上还是眞誠的。意見面前記中說把林，何兩同志的批評的反批評和我对党的态度完全区别开来，完全用的是討論問題的彼此学习的同志态度，这意見書上提出的問題大家表現在今天的文艺界，这些是他早已預料到的。設想一个敌人，他能发現党的缺点，能非常眞切的誠恳的，毫无顧虑的提出嗎？但是碰了壁，只能写“我的自我批判”来遮盖迎面的打击；更出其所料的竟实然来一傾天的陣来雨，响霹靂，当头棒，給打得死亡的。

我所以有这样的疑难，主要是从上面事实分析中有这么一个可能性，就是胡风和某些党員有不同意見，而这部份人的理論是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而且在文坛上佔統治地位，拿胡风的話，就是庸俗的机械論者。他們是党的文艺工作的領导者，一直以馬列主义自封，自以为是毛澤东思想的註釋，他們建立了一整套理論，但是他們的理論（包括林、何）对当前文艺发展起着一定的危害作用。公式化、概念化，普遍在作品中存在，这不能只看作一种現象，而有其深刻原因的，文艺界爭鳴中所暴露的問題也說明这一点。正因为他及时地預見到了这些問題，所以建議也确实击中了要害，触及了瘡疤，因而必引起以前的敌对者，現在的領导者，确切地說是一些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的慘痛，就認为有对立情緒，而掄起了統治者的棍子，不死你也甭想活，这种可能性，我提出来也觉得有些冒昧，因为可能有些主管人握有鉄証，我就啞口无言了。

不过仅仅这三批材料要信服人是办不到的，而且对这些信札的来源我也一直在猜疑，終于联想起我近傍那些偷看信件，迫人交出日記的卑劣行为的人，但是保量克制这种联想，因为在这光明磊落的时代与这种行为是受抵制的。

当然这篇文章唯一建立的基础是一个假設，假設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再强調一遍这假設，若是假設成立，那么胡风事件倒是一出“三害主演的令人瞠目的悲剧”，否則这文章也只当罷論了，我衷心地希望它作罷論，但是最迫切的希望还是要求公佈胡风事件眞相。

洛　曼

（六）答同志們問

关于胡风問題我的思想是从学习“傳达毛主席的报告”时开始的。那时談到人民內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問題时，我首先有这样的問題不清楚：胡风是由人民內部矛盾轉化为敌我矛盾的呢？还是本来就是敌我矛盾？我在小組討論上曾提过此問題，但沒有得到解答。同时还想到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中鮮花和毒草都可以放，胡风是不是亦有可能只是一个毒草呢？是不是有可能在当时将人民內部矛盾錯誤地搞成为敌我矛盾的呢？在毛主席的报告以前，关于人民內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問題在有些人的思想中是不象經过他分析后那样清楚的，我覺得这些個題可以重新考虑一下，才更能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后来整风运动开始，看到有的大字报亦提过此問題。在这时期，恰好因公去北大兩次，而且只有兩次，一次是到北大去听一門新开的課，一次是应北大物理系、电子物理教研組的邀請作了一次科学报告（这里說清楚一点，以免同志們怀疑我專門是为抄此大字报而去的），順便到清华大学一趟，（那里音乐室的先生們我是很熟习的）。恰好看見有許多人在看新水和舘上所貼的几份大字报，（决不是光知道有此大字报而去的），我看到“公审胡风”“胡风事件再提”兩篇，对胡风問題的怀疑，說得很有道理，在內心上起了一些共鳴，并認为反駁的那篇（即“为历史辯护”）有些論点則不够充分，（当时反駁的文章就此一篇），同时我还感到双方討論問題的态度是很好的，我当时認为既然很有“道理”，态度又“很好”，所以也就积极地决定介紹到南开园来，作者自己曾經怀疑过的胡风問題的一些充分的理論根据，在此大鳴大放之济可以用来活躍一下南开园的爭鳴空气！眞理是愈辯愈明的，同时还早有过將校外情况向校內介紹的先例。所以这种作法在当时也就認为很自然的了，决无想借此来打乱整风步驟之意，因早就有人提过…… 并討論过此問題了，文章是第一次到北京时介紹来的，一个多星期以后，我就到北京去作科学报告，原先打算在南大如有什么胡风問題討論会时，口头上当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評論，后由于作科学报告需要一些准备，时間很紧凑，也就沒有写什么評論了。在“清华园見聞”上而有人提的意見是希將此文向全校介紹，印发給大家等。沒有人要我写評論之类也就这么拖下去沒写了，所以上次回答說：“拿不出成品来”，是完全眞实的，假若是“順則进、逆則退”的說，这長时間并沒有看到有什么質問之类的話，提的意見都是認为介紹此文是很好的。有成品的話在当时要发表是不会有什么顧虑的，幸喜沒写什么評論之类，否則对那时讀者們思想中更会起一些坏作用。

現在回头来談所起的影响，在我將这篇文章介紹到南大时（其中有一篇“为历史辯护”）不能算是右派言論的，由于自已政治覺悟不高，沒有看出当时右派言論正占上风，介紹此文章来时，更助長了声势，造成了一部分看此小字报的同志們思想上的混乱，我应負此責任。这是分为遺憾的，所以希望同志們今后对这些論点多加批判、分析。自己亦主現地努力消除这些后果。

这里，我也不得不坦白地告訴大家：我对文章中的一些論点經过一些分析研究后看了一些參考材料，除贊成他們的一些基本論点外，竟然还多生出一些問題来，为暴露自已的思想使同志們能够更好的帮助我分析、批判現略举几点。按照第三批材料所說的胡风很早就是党的忠实走狗和帝国主义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長期地伪裝革命，潛藏在人民內部干着反革命勾当。而在何其芳同志的“現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現实主义的路”中說过，胡风同志很早就是參加革命文艺活动的文艺工作者，他一直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立場这是首先肯定的，在林默涵、周揚对胡风的一些批評中也說过这类的話，当然这句話是在揭露他之前說的，所謂立場一定是由一些行动換得的。当然不能是假裝的，但是这也就說明了他至少在客觀上（代表面上）对革命起了一些好的效果，也就是对美蔣不利。但在三批材料中到底对革命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在材料中是說得不太充分而明了的，和特务机关的密切联系，在这些密信中也不是頂充分而明了的。美蔣为什么这么蠢，花这样大的代价讓他長期潛伏地干着那些本可以公开来活动而得到的目的，这样就可以消除在群众中几十年来对他們本身极为不利的反蔣、反帝、反封建的言論，这是很难理解的，何况他們根本上也沒有想到他們的王朝会有一天被人民的

鉄拳击碎而預先来一个"复辟"之类的作法呢?

同时这三批材料中似乎很难找出一处絕对不能用人民內部矛盾而只有用敌我矛盾才能解釋得通的事，也似乎找不出他們最終想夺取政权，或將来依靠蒋等夺取政权的充分証据，同时还必須注意到胡风事件是发生在宪法公佈以后，所以处理問題决不能象大规模的阶級斗爭还正在决斗的时候那样如土改和第一次鎮反时期是必須采取一些非常措施的。

材料中还有一些个别的"編者按"中亦有些不太恰当或缺乏說服力之处。

由于有这些問題的存在不能得到解决，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認为：据人民日报所公佈的三批材料不足以充分的証明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当然这是一个危險的令人憤慨的思想，但是这也是眞实的，我的思想到目前为止的确这样。所以希望同志們多加帮助，由于我的一些基本論点就是由他們的基本論点而来的，所以首先对他們一些論点能进行深刻的很有說服力的批駁，那么我的問題也就差不多解决了。

由此作为前提出发，到目前为止，我認为將来經过公审胡风分子結局会有三种可能，第一、摆出更多的更充分的鉄証来，这决不是能用人民內部矛盾来解釋得通的，三批材料也是証据，但居到次要的地位，这主要是用来教育人民，提高政治覺悟，識破兩面派手法的反革命分子之用，不是用作为証明他反革命分子的前題，而只能認为是一些重要的补充这种可能是最大的，第二种可能他是一个反动分子，有着反动文艺思想，以及一些破坏活动。但还不能叫反革命，这种可能也是有的但很小，第三种可能是当时將人民內部矛盾錯誤地判定为敌我矛盾，这也难怪，因胡风隱瞞历史，又有个小集团嫌疑极大，加上个别領导人物，还有点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及主观主义的因素，于是錯誤地判为反革命了，而实質上胡风至少在主观願望上是的确拥护社会主义的，当然这种可能性就更小，但并不等于完全沒有。

这儿只是上面的一些理論的推論，如上面的論点推翻了，那么这些推論就不成立，剩下就只有一个可能，不管怎样胡风必然是反革命只是罪的輕重而已。

这个問題是概括我的思想中的最主要最重大的問題，其他的問題是比較清楚的認識，为了抓着主要問題故不詳談，所以赤裸裸地告訴大家，只能算是暴露吧說不上深入認識錯誤等。希望帮助指正。

最后作二点声明：

1. 我和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任何一个人从不相識，从沒有任何联系。
2. 清华大学这几篇大字报的作者我也从不曾相識，从沒有任何联系。

"附"由于一些同志們的建設和要求，將清华園見聞中关于胡风問題三篇文章重行公佈于后，以便于駁斥这些論点。

此致

敬礼

丁守謙　1957.6.

× × ×

丁守謙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从大家的发言里可以看出，对'党天下'含义的不同理解，可以得到不同的結論。我認为应該首先弄清含义，才能下結論。关于这一点，应当叫儲安平尽量发言。在他沒有說清楚'党天下'的含义之前，下結論是过早的。"

"儲安平的发言是在挖根，是在消灭三大主义，他所揭露的事实是存在的，'三害'在共产党領导的国家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点就值得我們动腦筋来想一想。"

"即使是毒草，我們也可以从中吸取一点东西，例如鴉片有毒，也还可以治病。

"对于一件事，都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理解，例如一个人对我好，可以了解为友誼和关心，但也可以怀疑他是不是想拉攏我，利用我。对儲安平的发言，我們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理解，应該多听听反面的意見，即是他有一套，也不要有过多的憂慮。"

“关于党和人民的关系，把党和人民等同起来，說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这在一定时期是对的，在解放前，即使是搞破坏活动，如破坏鉄路等，也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解放初期，土改、鎮反、思想改造等也还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掌握了政权，成为統治的領导者，領导和被領导之間就发生了矛盾，領导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乱用了群众对党的拥护，和人民不再是共同呼吸，而发生了个别环节上的蜕化。”

“历次的农民革命也都是如此，在革命期間，这些領导者也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受人民拥护的，但一旦取得了王位，就不再为人民利益着想，压迫起人民来了，必須認識到人民是第一性的东西，党是第二性的东西。”

“我有个問題，无产阶級專政的国家，三害产生的根源与具体的制度环节，难道能說沒有关系？我有个想法，就是什么是群众意見，最好能用民意測驗的方式，来测驗一下民意。”

“比如，过去文艺报有个秘密的通信組，上面說什么，下面就有許多讀者来信，表示拥护，說成这是群众意見。”

“剛才有的同志說三害的产生，有历史的根源，这样說是对的，但是三害的根源因素很多，不过，最使人感到兴趣的是現在的社会不是將三害削弱了，而是將它发展了。”

“如何將三害的可能性变成現实性的問題很重要，究竟是什么因素能使它变成現实性，是值得深想的。”

“历来的一些运动傳下来的工作方法，都是領导說什么，下面做什么，沒有人敢反抗，下面只是体会政策而已。”

“三害的根源到底是历史根源， 还是現实的根源， 究竟那一个重要，要用数学算一算，就可以得出結論来。”

“官僚主义的克服，要扩大民主，例如，利用民意測驗，我們还要强調，要記住，从認識論上講，人民是第一性的，党是第二性的，人民有一定的見解，我認为是不合理的，我就发表意見，这不等于反动。”

“一长制的問題，是值得考虑的，一长制是三害根源之一。”

“关于領导，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要設一个党員作头儿，应当想一想，是否有才能高而不放在領导地位的問題，党的領导，不应当强調到不适当的程度，把每一个地方都放一个党員作头儿，例如北大器乐团，也放一个不称职的党員做头儿，象学校这样小的單位，不一定放一个党員做头儿，解放前的学生运动，实际是党領导的，但是出面領导的都不是党員，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考虑这样的領导方式。”

“有几个党員腦子里有宪法？根本不按宪法办事。”

“任何党团員都应当記住，只有官僚主义者才忘掉了一切都应当怀疑，分清是非不是怀疑派，有合理的怀疑，如我对胡风是否是反革命分子的怀疑。”

“馬列主义是要发展的，要不断充实，我們也可以发展馬列主义，一切要爭鳴，来几个回合再下定論，修正主义也要仔細的想一下，各种流派都可以发展馬列主义。”

“以前开人民代表大会，发言只有兩种內容，一种是拥护，一种是檢討。”

“这次的学生运动，繼承了‘五四’运动的傳統，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是一个偉大的运动，为什么人民日报不报导北大学生活动和大字报的情况呢？做为純新聞也应当报导。”

“工会应代表会員的利益，現在的工会好象是文体委員会，人民日报揭露工人鬧事的問題，工会应有自己的权力。”

化學系助教　方慧麗

我現在对問題看法有体会了，最根本的是立場問題，反正你站在工人阶級立場說話，什么都对。

光强調立場問題是否能发揮独立思考？

各个运动都是一套公式化，沒有什么道理可講；先来个动員报告，然后討論找典型，做总結，根本不解决問題。整风也是这样。在每次运动中，只有兩种人，一部份倒霉，一部份能爭取入党。爭取入党的是一边倒，沒有个人見解，我十分看不起这样的人。

今天講話就是明天批判、斗爭你的材料。

在整风中靠党的积极份子是啞口无言，……难道党員没有看法嗎？以前他們都是站在斗爭最前綫的，……这次为什么不提？这次整风提意見是对每个人的考驗，看你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

党員整天忙忙碌碌，不学无术。

反右派是錯誤的。現在还没有做整风总結呢，你看將来一定会把这个缺点总結进去。

平时帮助我解决思想問題的人，就是制造我的思想問題的人。

党对肃反运动中一些青年的心灵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創伤，如何彌补？

刘正之（右派分子，肃反时头发早已白了——註）被斗錯了，头发都白了，人也老了。

胡风不是反革命，罗蘭的文章好，有說服力，內容凶，批駁困难。

二万五千里长征干部只能搞政治工作，不能領导高等学校。外行不能領导內行，党委应彻出学校，实行民主治校制。

解放前师生关系好、密切，解放后师生关系淡薄了。

一个教师对他的学生評价的好坏，只在于他的业务，而不在于思想。

要考虑个人前途，填表时要多考虑自己的兴趣、志愿，不用考虑組織分配。过去我做团支書只能带头服从分配，結果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念專科和提前毕业都是牺牲品。

新聞不自由，报喜不报憂。党內知道得比团內知道得多。

譚天荣有办法，能在困难的場合下說話，能独立思考，是个天才。大家没有資格去批駁他。譚天荣是高才生，他的論文早就做完，哲学系教授要他做研究生。

桑健是真正的共产党，其他党員都是木头的，太坚持原則，不发表个人見解。

化學系助教　沙昆源

攻擊黨的思想改造

知識分子是一个阶层，思想改造在学校不适合，尤其对老教师更不合适，所以思想改造不应該用这个方式进行。

思想改造是党打击了知識分子，副作用大，成績少，缺点多，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不高，也由于思想改造所致，因此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党强迫改造。

陈伯达报告說：科学家的思想改造，可以通过研究科学道路进行自我改造，走向社会主义（断章取义）。如一个日本經济学家，是通过研究馬克思主义正确性參加党的。

同意范朴齋的謬論，知識分子是超阶級的，党对他們应当三顧茅芦，这样知識分子才"士为知己者死"，因而把知識分子应当放在党之上。

化學系助教　邢肇基

（一）公開支持葛佩琦言論，並爲葛井護和伸寃

共产党完了中国也不会亡，人家也不会亡国。党既然与各民主党派和平共存，各民主党派就应与共产党平分秋色。葛佩琦說要杀共产党，你看共产党的錯誤那么多，如不改，群众还不起來杀共产党的头嗎？

統購統銷搞糟了，故棉花、粮食、猪肉等供不应求，而宣傳工作中一直講是人民購買力提高了，其实不見得如此，如猪肉卖多或卖少，只要問一問猪肉店老板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对葛的言論可以这样來理解，也可以那样來理解，如昨天（5,31）人民日报上登載某县召开节約粮食，禁止全乡养鷄，結果在兩天內全乡

把所有的鷄都毒死了，人民日报要批評葛佩琦首先就得先批評自己。

（二）攻擊黨的發展工作，反對黨的領導

党的发展工作是一种策略，发展党員根本不是凭觉悟，而是凭需要，如党提出知識分子政策，十二年內赶上世界科学水平后，須要知識分子就不管觉悟如何，就拉入党內。党不关心青年入党問題，难道在我們青年助教当中就沒有以高陈主任觉悟更高的嗎？陈先生在业务上我服气，在政治上我不服气，难道陈天池先生的觉悟就比我高嗎？陈先生在入党前很关心同学，入党后就变坏了。

同意民主治校，党委会不学无术不能領导学校，但教授治校还不够，还得要助教参加。

（三）攻擊黨的幹部政策

过去我不知道倒底是怎么一回事，工作了一年后現在才明白，共产党員可以坐在桌面上和系主任要工作，落后群众可以不服从分配，就是共青团員和积极分子最倒霉，是傻瓜，組織把他們的行李扔在水里就是水里，扔在火里就是火里。系里有宗派主义，留研究生都是党員，共青团員要做研究生系里不答应，而史延平（党員）可以不服从分配回校做研究生。刁傳芳凭什么到有机当助教，她不懂得业务是不学无术，不懂业务不配做有机分析工作。

（四）攻擊肅反政策

肃反扩大化，善后工作有缺点，故使被斗爭的人長期处于孤立态度。肃反办公室的方針是第一查反革命活动，第二查社会关系，第三查思想，都沒有問題就扣上一个自发的反革命分子。

（五）否定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当前主要矛盾是建設社会主义与青年学术水平跟不上的矛盾，看一个同志的觉悟如何，就是看他的业务工作如何，凭政治是解决不了問題的，解决了业务問題，就是他的觉悟的表現，业务即政治，因此他反对系党支書的："目前青年教师主要是政治与业务的矛盾，故要求青年教师做的社会工作，关心国內外大事"的分析，并認为陈天池先生是以教育者自居，教条主义。

阶級分析方法，对阶級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一种負担，是个包袱，使他們积极性不能提高。过去組織上老說我个人主义、自高自大，资产阶級影响，但我又不知如何背叛家庭，反感很大，目前国內主要矛盾为人民內部矛盾，强調阶級分析不利。

（六）反對資產階級改造，同意章乃器、李康年的言論

工厂既然被拿走了，资产阶級就沒有兩面性，同意定息二十年，李康年的工厂值多少，国家就应拿多少，这样才是眞正的贖买。

（七）其　他

上街看到流入城市的农民討飯做乞丐，其他城市也有，統購是农民把粮食卖給国家，統銷是国家把糠卖給农民。

解放軍工資太高，高級干部与群众生活相差太远。現在說生活苦，叫我吃糠都可以，可是要大家一起吃，要大家一起苦，不要有人吃糠，有人錢化不了。解放軍以錢引誘中学生，小城市、农村姑娘。

青年助教不敢鬧工資問題，否則扣一个帽子，其实老教授、高級干部鬧的才厉害。

生物系輔助員　李崇熹

（一）攻擊黨的領導

"我們中国共产党很聪明，接受匈牙利事件教訓，提出扩大民主、百家爭鳴等方針。这是在人民群众的逼迫下提出的，再不这样，党就压服不下去了"。（"再論"学习时說）

"党今天号召大家'齐放'和'爭鳴'，不能不叫我怀疑，回忆过去几年不滿党的言論，儘管这些言論是正确的，都挨了大棒。共产党要想整一个人（往往是为了完成阶級斗爭'任务'或其他），这个人就成了斗爭的牺牲品。最可笑的是一些党員自封为馬列主义者，所領导的运动成績总是肯定，他們所主張的都絕对正确；被打击者只能服服貼貼，那些还嘴去解釋的人，不都被打得爬不起来了嗎？'落后分子'，'立場問題'等大帽子……压在人們头上。至于胡耀邦說的：青年人落后入不了团应由自己負責，青年团不負責任，就更无法理解了。"

"只相信几个'积极'分子，不相信大家，是党几年来工作的最大缺点。那些'小报告'們报导片面就不用說了，他們踩着别人的头往上爬，彙报别人的优点輕描淡写，远近有别，說到别人的缺点就語气深长，添花戴叶。这就不能全怪人們和党有距离。'爭鳴'的会上，一些党員还在教条式地发言，有的人不发言，不知他們在玩弄什么圈套。思想改造运动騙过我們一次坦白，忠誠老实运动，組織上宣傳相信我們了。但'肃反'运动又把人們自己坦白的材料老賬重查，又騙了我們一次。这次又叫我們'放'，但願这次不再受騙。"（"一点感想"編于黑板报）

"我恨一切人，想用刀子戳死人。"（思想改造时說的）

"入了团就跟拴在树上毛驢一样，用鞭子抽，要跑都跑不了。"

"要入团就必須把自己的爸爸和媽媽罵得和王八蛋一样。"

"我学馬列主义，目的并不在于建設社会主义，我建設什么社会主义？我是要掌握理論后，好来找尋党中央政策中毛病。"

（二）攻擊肃反運動

"罗隆基成立平反委員会，我認为他是个人物、公正，給一些錯斗的人出气。我認为应成立。我看报总是关心是否有成立的动向。"

"法西斯主义我想就是黑暗，大概肃反也就是黑暗。人事工作、保卫工作都算計人，这种工作骯髒"（八月一日交代）

肃反干部"張牙舞爪，和瘋狗一样。"

"党所領导的一切，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任何工作都这样說，这就是教条主义，肃反比历次运动都坏，生物系更糟。我原来对系里党員有意見，后来我想这是上級的布置，也不能怪他們。本来我很佩服王金鼎同志，因他講話邏輯性强，但一想肃反，我就恨他。"

"我認为学校的肃反錯誤很大，成績是极小的，原来認为反革命实际一个也不是，肃反是否需用群众斗爭的方法进行，我很怀疑。""党中央說'肃反运动是健康的'，这是教条。天津外地各大学肃反方式一律粗暴，是否中央布置的？毛主席提出：'不能翻案，否則农民要打扁担'，这不正确。难道不考虑我們被肃者的影响"。"上樑不正下樑歪。我国肃反我認为可能在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錯誤思想下进行的。""法院根据什么搞反革命，冤枉了好人？宪法是党領导制定的，但肃反运动时党又領导破坏宪法，这不是假民主嗎？資产阶級的民主我不理解，但肃反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主，我是不願接受的。""我要求收回肃反中所写的全部材料，因为是他們給我个公式，被迫写的。履历也要重写，因为只有把自己罵个狗血噴头才算进步。"（与津市人民代表談話）

"爱情无阶級性、需要政治基础是教条。我不希望我的爱人斗爭我。"

（三）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我認为没有一个制度是完全好的。社会主义比資本主义好多少值得怀疑。我只要活着，我終能看到誰是誰非。匈牙利事件对我的鼓舞很大，証明我所說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我国各运动中斗爭对象是匈牙利事件的点火者，三十年后一定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八月一日交代）

（四）反對我國外交政策

"我主張走鉄托和印度的中立路綫，这样在国际上反更有威望。我認为鉄托路綫比較好，是一个新的共产主义路綫。（八月一日交代）

經濟系　秦福林

（一）黨的領導應該削弱

不論就現实情况或历史发展规律上而論，党的战斗力是減弱，也就是党的領导力在減弱。但絕大部分人却錯誤的認为党的战斗力不是減弱而应是加强。

一、錯誤的根源：由于斯大林的随着社会主义发展阶級斗爭越来越尖銳的錯誤理論指导下，因而自然的得出下述結論，由于阶級斗爭越来越尖銳，因而党的領导随着斗爭的尖銳也必然加强，因而在这錯誤的理論指导下引导出来的結論也必然是錯誤的。

二、为什么党的領导力在減弱：

党的領导力減弱也就是体現在党的战斗力減弱上。

① 党的战斗力体現于它的成員，也就是每个党員。而党員不外兩部份，老党員、新党員及爭取入党的人。老党員表現得自高自大脫离群众，适应不了客观形势需要，一方面是由于宗派主义，自以为天下是老子打的，因而造成盲目自大，失去領导能力，另外是由于客观形势发展太迅速，自己既不力求进步，而文化水平又极低淺。試問，这样党的战斗力和党的領导力怎能不減弱呢？

新党員及爭取入党同志，由于宗派主义形成群众“无用武之地”造成这些人入党动机不純，入党后 “油条” 退化，上述不能說是个別現象。

② 历史发展規律：党最終必然灭亡。如何灭亡呢？就象人由生到死，是由党的領导力逐漸削弱以至失去存在的必要性而自告灭亡。

三、党与这一客观眞理背道而馳：

党为了加强領导力采取“党天下”的办法这是完全錯誤的，必須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党外人士职权，按力做事。对于党內的某些人有必要“下轎”“下台”。

限于篇幅，不能詳細表达。如某些人認为有必要而且願意的話，我願意在自由論坛上相見。

（原載本校学习簡报第2期题为“党的領导应該削弱”）

（二）其　他

“要求改选学生会， 反对党团包办一切”， “学生会应該自由竞选”。

“优秀生，留学生不应全是出身好的党团員，只要他学习好，只要不是反革命，去留学又有什么不好呢？”

“各民主党派由于党的重視不足，而在发展上有困难，虽說是互相监督長期共存，但事实上都成了党的应声虫。”

“党既然能領导自然科学，而向自然作斗爭是永远不能消灭的，这样結論就会說党也是不会消灭的，这一結論是与毛澤东同志的提法不符的，反之，在向自然作斗爭时党的領导就应該削弱。”

經濟系　冷寅勛

（一）攻擊馬列主義

“无产阶級政治經济学在某些地方不能自圓其說，不能以理服人。如馬克思劳动价值論和資产阶級需要价值論沒有什么区别；无产阶級貧困化很难解释；經济危机的理論能否成立是个問題。”

“我認为馬尔薩斯人口論有一定的道理，人口增長問題确是个很大的問題。”“馬克思主义的人口論不成体系。而馬尔薩斯人口論則已經成为世界体系。”

“我怀疑共产主义人生观究竟能把一个人教育到什么程度。象斯大林这样偉大的人物，居然都犯了严重的錯誤。那末，一般人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就更不可靠了。”“我現在虽然学习政治經济学，但我担心將来会成为一个唯心主义者。”

“宪法上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修馬列主义課是矛盾的。宗教信徒

都是唯心主义者，如果必修馬列主义課是学不好的，而且也是違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就是效試打个五分也沒有什么用处。所以，馬列主义課应改为选修課。”

“我認为資产阶級有片面性，但无产阶級也有片面性。”“一个問题有正面和反面，阴面和阳面；完全站在正面就看不到反面，完全站在反面就看不到正面，为了看到問題的全面，就必須站到側面去看。”

（二）攻擊黨的領導

“党的宣傳工作有很大的片面性，歪曲性，只宣傳好的，不宣傳坏的；只宣傳正面，不宣傳反面。对資本主义国家好的宣傳少，坏的宣傳多，甚至有些不符合事实的眞相，失去新聞的眞实性。”

“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样領导社会主义革命。”“各民主党派也領导中国人民，党与民主党派是班长与学习干事的关系。”

“共产党、民革、民盟都代表一部分人民，誰也領导不了誰。”“在以后阶級消灭了，各民主党派就不一定是代表一个阶級了。那时，民主党派就成了各阶层的政党，各民主党派的政綱与共产党的政綱目的都沒有本質的区别，而只有方法、政策上的区别。因此，今后竞选、輪流执政是可以的，輪流执政是不会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不应該反对竞选，因为共产党得到人民的拥护就不会怕人民不选共产党的。假若怕，那就是說共产党不得人心。”

“开任何会都要党团干部、积极分子参加。这样，落后的方面就不能代表。因此，落后与先进的矛盾就不能解决，因为落后思想得不到反映。”“人民政府是党政不分，学校也是党政不分，应当把外行的人撤下来。班上的工作誰也都可以干，不一定非党团員才行。”

（三）誣蔑社會主義制度

“人类的末日將要到来。其理由有三：①太阳將发生黑子爆炸。②科学的发展將要毁灭人类。③物資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遞增。”“六十年后世界末日就要到了。”

“从私有制轉为公有制初期，有本位主义，所以有官僚主义。”

“向工人宣傳馬列主义，有利于产生官僚主义比私有制的可能性更大。”

“公有制比私有制产生官僚主义的可能性更大，而且严重。其理由是：私有制（指資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資料私有，所以資本家对财产的經营管理都特别关心，不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而公有制（指社会主义国家）則不然，一切都是靠上級指示办事，企业的管理人員很少动腦筋，容易产生官僚主义。”

“地方机关的官僚主义可以通过向上級机关的揭发和控訴而克服，中央机关的官僚主义就必須通过大民主方式去解决。”

（四）誹謗蘇聯

“匈牙利事件，苏联不应当出兵，第一次出兵是錯誤的。第二次出兵不合国际法。”“苏联出兵匈牙利和英法侵略埃及沒有什么区别。”

經濟系　鍾世賢

（一）誣蔑肅反運動：

“肅反是新旧时代交替不可避免的悲剧，肅反是侵犯人权，違反宪法，私設公堂”。

“毛主席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內說肃反采用群众路綫也会产生缺点，并提出有錯必糾这都說明肃反有严重錯誤”。“我也同意章罗提出的平反委員会”。

“自杀的究竟是怎样呢？是否是反革命呢？往往一个人受冤屈到极点，他宁願自杀而不願活下去这是很自然的”。“要求党向群众公开，向死者家庭道歉，准許同学写慰問信”。

“肃反把反革命分子与政治历史上有問題的混淆起来。因此我为党担心，怕党失掉人心”。“把好人和坏人放在一起，用机关枪扫射，当

然打死了反革命，但也伤了好人，以后再做善后工作就晚了”。

“群众斗争会搞的相互猜疑，弄的几个人都不敢在一起說話，怕受怀疑，人人自危”。

（二）攻擊人事制度，打擊、謾罵黨員和積極分子：

“檔案应該公开，讓本人知道，本人还可以写出自己的意見”。“人事檔案被一兩个人包办了，如果反革命分子加上兩条就搞不清了”。

“党員只考虑三件事——离婚、恋爱、升官发財”。“积极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差不多，积极分子是没有腦筋，是盲从”，“桑健是先进的眞正的共产党員，其它共产党員都是落后的，班上的党員应向他学习”。

經濟系　白俊義

（一）崇拜希特勒。

“希特勒很有骨气，有民族气节，要是我是德国人我就要写一部希特勒民族骨气的詩。”“希特勒这种人很能干，这样大的年紀不結婚，能忠于自己的事业。”

（二）曲解立場與眞理的關係。

“站在无产阶級立場就能看清問題嗎？我不同意这种說法，不站在无产阶級立場也可以認識眞理。”

經濟系　陸愼成

（一）對黨的人事制度不滿

“北大寄来的材料中，对人事制度进行了攻击。这張大字报触动了我的心。眞的！为什么檔案材料不讓自己看看？檔案材料不必要对自己进行保密。自带檔案袋时，还要加火漆，我認为这是对人的不信任。我想到轉业的一份材料自己都不知道，也可能缺少几份。曾要求看，未成。因此一直不滿在心。”

（二）歪曲黨的政策、攻擊黨報

“三反中存在的錯誤与上級領导有关。那时一层一层的规定百分比。又在方針上要狠！狠！狠！如若三天打不出老虎，領导干部就要停职檢查。”党是“逼迫群众向貪污犯进行斗爭。”“三反、肃反应用的方式是不聰明的，用这种方式是否能把反革命分子吓出来呢？不可能的！自己經历过几个运动，但就三反运动說，是不滿意的。覚得这没有人道主义，反貪污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这样經过司法机关是不好的。这种方式确是侵犯人权，不能起积极作用，而起的付作用更大。”

“我想不通：在党初期提出百家爭鳴时，說毒草也可以放，而我們今天的态度是毒草要鏟除。所以，我很懷疑是方針政策的变化。我們今天为什么提出批評呢？这就是不讓社会主义的毒草放！”

“我完全同意儲安平的办报观点，是事实就登。”“我們的新聞报导，是报喜不报憂。如农业合作化偏差报导少。各大政治运动中党領导的严重錯誤报导少。”“我們国家的报紙是清一色的，都是看着人民日报的眼色行事。”

（三）攻擊黨組織、挑撥黨群關係

“党工作的成績，大家有目共睹。再說一套有什么用呢？目前三害严重，我認为官僚主义比帝国主义还利害。大家要雷厉风行地把三害打下去。”“党的整风”是誘敌深入，一棍子打死的策略。”

“对有些維护党的利益的人，我思想上很反感。我的思想和有些人有抵触时，就听不进去正面的話。”

“现在是颳十二級颱风的时候了，一些人都在見风轉舵。”“我一向是后进者，我不会世故，如果我世故的話，我也会照抄人民日报。”

"看人不能从印象来看，当然改变印象較难，有些人敢于发表自己意見，敢于独立思考，这是否就是落后呢？"

"党团教育工作做的不好，团委对团总支，团总支对分支，分支对每个团員都不了解。"

（四）攻擊蘇聯共產黨

"斯大林錯誤在晚年已經知道，为什么在廿大才提出！而廿大也没有提出？""赫魯曉夫又說在斯大林生前提出是不可能的：可能被称为是破坏党的团結，这是不能自圆其說的。"

"我認为在反对个人崇拜时是应該把斯大林的錯誤重点的談出来，因为一般人看法是强調于一方面的，所以强調斯大林缺点的方的，是正确的，是必要的。"

（五）拒絕改造

"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因为在每个运动中都有一些人爬上去，和一些人被赶下来。""我是独立思考，你們不应該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言。当沒有了解别人意图时，就不要乱加批判。""大家都要問我几句，这样就显得进步。""我不同意班上对我一个人开火。昨天是希望大家提批評，但不是把人置于死地。""我对这种会議表示抗議！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向組織請假，不参加会議！昨天晚上的会議，（註：經济系和中文系工农学生的反右大会。）我沒参加，随便你們怎么处理。就是开除我的国籍、学籍，我也不檢查！回家去也行。"

經济系 陸訓壽

（一）否定教學改革成績妄想資產階級經濟學復辟。

他公开主張取消全国各課統一教学大綱，他說："我們学习中，一方面感到課程內容重重复复，另方面許多应該学的沒有学到，……如我們学經济的資本主义生活中許多問題我們一点也不懂……連現代的資产阶級一些术語也搞不懂……。学了国家与法权，連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組織都不知道……。我眞不理解为什么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識要一直講到学生发膩呢？为什么另外一些应該知道的东西却一次也不講呢？难道講了以后学生的思想就会資本主义化嗎？当然，要怪罪我們的老师們是不对的，因为老师講課必須按照教学計划教学大綱还要根据人民大学出版的黃皮書啊！""資本主义經济学課开得太少，应該多开。不然的話，二十年后，資本主义經济学就要絕跡了。"

（二）攻擊黨的人事制度。

他反对毕业生統一分配。他說："談到分配工作我是有意見的。55年毕业生有許多教地理、历史、美术，甚至有几位教体育，这件事談起来也許令人吃惊吧，难道在学校中鍛煉就是为了毕业后教体育嗎？这么些年来据我所知道沒有一个經济系毕业学生被分配到科学院和經济研究机構中去的。这么多年来科学院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未添嗎？未必吧！是南开經济系毕业的学生个个都不如人嗎？我想老师們也不同意我这个結論吧，原因在那里呢？这就要搞人事工作的同志来回答了。是不是否定了南大經济系的老师也把南大經济系的学生否定了呢？"

他攻击选拔留学生的办法。"在选派留学生問題上，……不僅要党团員，而且还要家庭出身好的。試問这不是唯成份論嗎？而且这一笔寃債叫出身不好的人到何处去申訴呢？他們不能自由选擇娘胎呀！我要求此后选派也好，投考也好，在政治条件上，是否看本人的历史和政治品質，而不看家庭出身。"

（三）煽動共靑團員脫離黨的領導。

他反对党提出的，党要求共靑团做什么，团員就应該回答"是"这一口号，說什么这是把靑年人培养成机器人"这样作就是培养盲从。"而且会給官僚主义者鑽空子。

（四）誣蔑肅反運動。

認为右派大字报写肅反等于零，这是受过怨屈的人写的。他說："斗的多，眞正的反革命少"。他主張肅反应采取一种新形式"根据再多一些，方式改一下才好"。这样"可以少杀一些人。"

物理系 張數玄

（一）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看法

"我認为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分为兩派，一派是斯大林派代表老路綫，一派是鉄托派，代表新路綫，我認为斯大林的錯誤，不仅是个人的錯誤，而是表示領导共产主义运动一条路綫的錯誤。我当时認为斯大林在世时，鉄托是叛徒，而斯大林逝世后，鉄托成为了同志，并且赫魯曉夫作为領导者了，这表示老路綫在苏联的失敗，而如鉄托所說的，'从南斯拉夫开始得胜的路綫，在苏联开始取得了成功'。"

"苏联的新老派已交鋒三次，第一次是貝利亚事件，第二次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辭职，第三次是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的反党集团，苏联現已有很大改革。"

"我認为波、匈事件起因都是由于新、旧路綫的斗爭，在波蘭、斗爭展开的比較好，新路綫胜利了，而在匈牙利，则在斗爭中被反革命份子投了机，以致造成了匈牙利的暴乱，所以我認为内因与外因是并重的。至于其他国家，我認为由于吸取了匈牙利的教訓，新旧路綫不再斗爭了，而采取协調的方式，如苏、南、阿、保等国領导人的同志式会見，我認为这就是协調的具体表現。"

"苏联撤回在中国駐軍，这是因为过去斯大林犯了錯誤而侵犯了中国主权。莫洛托夫是斯大林派，赫魯曉夫是改革派，鉄托所指的东方斯大林派大概是指中国。中国一定会有大变革。"

（二）關於國內形勢

"斯大林既然犯了錯誤，毛主席也可能犯錯誤。中央80%反对毛主席，党的地方組織腐化相当严重，有些党員是无头脑的人，三害份子很普遍。匈牙利事件后，証明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整个党都可能犯錯誤，因此中国也必然有一个大变革时期，而大鳴大放正是这个大变革的开始。"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口号提出来，党又发出了整风的号召，当时我的看法是認为党中央和毛主席認識了目前的形势，因而中国的大改变將要开始了。也就是說新路綫在中国將要开始胜利，由于中国情况，我的新路綫的內容有这样一些：

① 对百家爭鳴，贊成完全自由发表意見，不要一切标准，鮮花毒草有同样权利放出，而在爭鳴中馬克思主义只能作为一家，不应作为主导思想。

② 对民主，反对选举的單一名單制，而贊成自由竞爭。

③ 認为自由，人权是天賦的，是絕对的，反对'侵犯人权'。"